

# 族群互動與遷徙、擴散： 以清代哆囉嘓社人遷徙白水溪流域為中心\*

洪麗完\*\*

## 摘要

本文擬從地域史與族群關係史的觀點，以文獻史料、古文書、教會資料為主，輔以日治時期戶籍資料及田野調查、口述歷史等，以舊社在急水溪中游的哆囉嘓社，如何展開其搬遷上游（即白水溪流域）的行動，並形成以熟番為主體的社會為討論重點。除了重建哆囉嘓社址變動暨其搬遷沿山地區的歷史外，並探討十八世紀中葉，南嘉南平原（八將溪，今八掌溪以南）蕭壠、蔴荳等熟番族群（並及玉井盆地的大武壠社群）出走原鄉的緣由與影響，亦考察埔、漢勢力變遷圖像與熟番移住模式，並回應過去有關清代熟番聚居沿山地帶的主張之適用性。

本文指出：熟番遷居原因涉及番漢族群、熟番社群間的生存競爭，且早在乾隆年間土牛新、舊界劃定時已展開沿山邊區的搬遷行動；既非國家政策安排而遷居，亦無關傳統生活方式的維持與否（帶著受漢文化洗禮的生活方式而移住）。另一方面顯示，乾隆中葉以來，因自然環境的限制，白水溪流域沿山地帶的漢人社會邊區，反而得以成為熟番生息休養的主要根據地。本文不僅釐清沿山邊區向來屬於臺灣史灰色地帶的歷史發展圖像，也有助於理解清代埔、漢族群及熟番社群的互動情形。

**關鍵詞：**族群關係、白水溪流域、哆囉嘓社、蕭壠社、蔴荳社、大武壠社群、土牛界

---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計畫「『開山撫番』以前沿山地區之聚落與族群關係：以北港溪、灣裡溪上游為例（歷史初期至 1874 年）」(NSC97-24101-H-001-037-MY2) 成果之一，特此向該會致意。本文得以完成，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與建議，以及前計畫助理李瑞源、現任助理李孟勳、鄭螢憶等，協助田調、資料收集與繪圖工作。並感謝今臺南市、高雄市（田寮區、內門區、杉林區、甲仙區、六龜區、旗山區）與臺東縣（池上鄉）、花蓮縣（玉里鄉、富里鄉）等戶政事務所，提供日治時期戶籍舊簿資料，以及岩前教會提供教會資料。同時，感謝地方上諸位耆老接受訪問。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1 年 4 月 11 日；通過刊登：2011 年 8 月 19 日。

- 一、前言
  - 二、哆囉嘓社之原始地理範圍
  - 三、漢人移墾急水溪中游與哆囉嘓社址變遷
  - 四、漢人、熟番他群移墾沿山丘陵地與白水河流域哆囉嘓村落之形成
  - 五、結論
- 

## 一、前言

族群遷徙為古今中外歷史上的重要議題，無論被迫「他遷」或主動「擴散」生活空間，皆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中。十七世紀的南嘉南平原（指八將溪，又稱八獎溪，即今八掌溪至二層行溪〔今二仁溪〕間），原為熟番（平埔族）生活領域；由於外力入殖，特別是明清時期漢族大量移入，雙方生存競爭結果，十八世紀中葉熟番主力逐漸退出，並移住平原東側沿山丘陵等漢人社會邊區（其中部分地區屬於界外），<sup>1</sup> 乃至內山地帶的趨勢。<sup>2</sup> 除了熟番之外，隨著西部平原拓墾工作日趨飽和，也不斷有漢人主動移墾與進駐土牛界外。<sup>3</sup> 為了釐清清代臺灣社會建立的全貌，有必要針對沿山邊區漢人、熟番的開墾活動，乃至埔、漢新移民與生番原住族群間的互動關係，進行整體考察。

清末開港、「開山撫番」以來，歷經建省、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清賦以後，接著進入日治時期，由於國家力量強力介入，伴隨政府的內山資源開發，對邊區社會衝擊不小，除了面對國家的管控外，高山族群和已長住界外沿山邊區百餘年的漢人、熟番居民，均面臨逐次移入的閩、客（以北客為主）<sup>4</sup> 新移民在社會經

---

<sup>1</sup> 指康熙 61 年的界碑或乾隆 25 年的土牛界以東地區。參見本文討論。

<sup>2</sup> 如大武壠社群移住界外楠仔仙溪、荖濃溪中游（今高雄市甲仙、杉林與六龜等區）。參見洪麗完，〈清代楠仔仙溪、荖濃溪流域之生、熟番族群關係（1760-1888）：以「撫番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4: 3（2007 年 9 月），頁 1-71。

<sup>3</sup> 如漢人在嘉南平原東側界外阿里山番生活領域的拓墾活動。參見洪麗完，〈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臺灣史研究》18: 1（2011 年 3 月），頁 41-102。

<sup>4</sup> 「北客」指日治時期自桃竹苗地區移入的客籍人士，乃相對於清及清以前自中國移入臺灣南部的客

濟活動上的競爭，以及較從前複雜的人群互動關係、文化交流活動。因此，從清代埔、漢移民進入沿山邊區，至日本殖民統治為止，長時段考察沿山地區社會變遷，無論就國家與社會關係、沿山區域發展或臺灣社會的形成過程與風貌之釐清，均有其重要意義。以上研究議題複雜，本文主要以清代哆囉囑熟番搬遷其社域東面白水溪流域為中心，並論及各沿山熟番村落的形成，考察熟番遷徙、擴散模式及埔、漢族群勢力變化圖像。

整體而言，南嘉南平原的平埔研究，已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其中頗多關於信仰方面的討論，<sup>5</sup> 少數及於單一平埔村落發展的論析，如人類學家潘英海的〈聚落、歷史與意義：頭社村的聚落發展與族群關係〉，從祖靈祭祀討論頭社聚落發展與族群關係；歷史學者石萬壽《臺灣的拜壺民族》，主要透過祀壺信仰勾勒西拉雅拜壺民族的分布狀況，與族群勢力變遷情形。<sup>6</sup>

此外，張瑋蓁〈東山鄉吉貝要聚落居民的生活方式〉，著重聚落空間與居民生活方式的討論；林志秋〈漢化平埔村落的神聖空間：以臺南縣東山鄉吉貝要聚落為例〉則重視宗教儀式的空間分析；林清財〈從歌謠看西拉雅族的聚落與族群〉、

籍人群「南客」而言。依據曾國明對楠仔仙溪中游地區的研究，南北客關係頗為緊張。參見曾國明，〈日治時代楠梓仙溪中游地區的土地開發與區域特色之形塑〉（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 24-50。

<sup>5</sup> 參見莊英章主編，《臺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8）。此外，較重要的論著包括：John R. Shepherd, "Sinicized Siraya Worship of A-Li-Tsu,"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58 (Autumn 1984), pp. 1-81；李國銘，〈頭社夜祭與祀壺信仰初探〉，收於氏著，《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4），頁 129-208；潘英海，〈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頭社太祖年度祭儀的文化意涵〉，收於莊英章、潘英海主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頁 235-256；潘英海，〈在地化與地方文化：以「壺的信仰叢結」為例〉，收於莊英章、潘英海主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二）》（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頁 229-319；潘英海，〈祀壺釋疑：從祀壺之村到壺的信仰叢結〉，收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 445-473；潘英海，〈「文化系」、「文化叢」與「文化圈」：有關「壺的信仰叢結」與西拉雅族群遷徙的思考〉，收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 163-202；葉春榮，〈葫蘆福佬裔漢人的祀壺行為〉，收於黃應貴、葉春榮編，《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7），頁 91-127；葉春榮，〈西拉雅平埔族的宗教變遷〉，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臺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1999年5月1-3日；葉春榮，〈阿立祖信仰的地方化〉，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年10月23-25日；石萬壽，〈西拉雅平埔族的阿立祖信仰〉，《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8（1981年9月），頁 143-181；翁佳音，〈頭社的阿立祖祭典〉，《臺灣風物》34:2（1984年6月），頁 98-104。

<sup>6</sup> 潘英海，〈聚落、歷史與意義：頭社村的聚落發展與族群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1994年6月），頁 89-123；石萬壽，《臺灣的拜壺民族》（臺北：臺原出版社，1990）。

《歌謠、聚落與族群：論臺灣西拉雅族的歌謠》，主要從西拉雅的歌謠看族群聚落分布與意義。<sup>7</sup> 以上均未重視聚落歷史脈絡的分析，亦少涉及族群關係的討論。

以上研究多半集中於日治時期的宗教、文化變遷等課題，部分則討論聚落發展，上溯清代，特別是有關沿山邊區熟番移住的歷史研究，十分有限。<sup>8</sup> 本文以哆囉嘓社為中心，分析其搬遷背景，並考察清代南嘉南平原埔、漢歷史變遷，有研究上補缺的意義。

哆囉嘓社在現代族群分類上，被劃入八將溪北岸的洪雅族（Hoanya），其歷史變遷卻與地緣上同在南岸、被歸入（狹義）西拉雅族（Siraya）及四社熟番（Taivoan）<sup>9</sup> 等族社有密切的互動。本研究可說明清代熟番的歷史研究，與其用「族群（ethnic group）」為單位，毋寧從區域入手較能掌握人群的互動關係與地域歷史發展脈絡。雖然南嘉南平原的平埔研究一直為學界所重視，哆囉嘓社的相關研究卻較少被重視。因此，本研究以哆囉嘓在白水河流域成立的村落作為討論對象，無論在清代哆囉嘓社群歷史變遷或整體平埔研究上，均具有重要意義。<sup>10</sup>

有關南嘉南平原的熟番他遷活動，如新港社群移入今臺南市左鎮、南化等區境；蔴荳、蕭壠、目加溜灣等移入今臺南市大內區（以上為大武壠社群故居），造成大武壠社人（也與漢人移墾活動有關），一則東向界外楠仔仙溪（今旗山溪）、荖濃溪中游，進入內優六社（即南鄒四社生番與魯凱下三社的芒仔、墩仔）的生

<sup>7</sup> 張瑋蓁，〈東山鄉吉貝耍聚落居民的生活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2）；林志秋，〈漢化平埔族村落的神聖空間：以臺南縣東山鄉吉貝耍聚落為例〉，《臺灣人文》3（1999年6月），頁87-116；林清財，〈從歌謠看西拉雅族的聚落與族群〉，收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475-498；林清財，《歌謠、聚落與族群：論臺灣西拉雅族的歌謠》（臺北：東江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sup>8</sup> 如溫振華，《高雄縣平埔族史》（高雄：高雄縣政府，1997），頁55-72；簡炯仁，〈大武壠芒仔芒社與高雄縣六龜鄉荖濃溪流域的拓墾〉，《臺灣風物》52:1（2002年3月），頁127-191，均曾論析大武壠社群的移住活動。此外，簡文敏，〈小林地區平埔族群聚落形成與發展〉，收於廖峰正主編，《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1999），頁84-98，偏向大武壠社群移居後的文化、宗教與歷史記憶的探討。

<sup>9</sup> 狹義西拉雅族，指今臺南市境的西拉雅族，其與玉井盆地的四社熟番、屏東平原的馬卡道族，合為「廣義」的西拉雅族。關於平埔族群分類問題，參見李壬癸，〈臺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臺灣風物》42:1（1992年3月），頁233。

<sup>10</sup> 筆者曾與陳秀卿共同發表沿山地區三個哆囉嘓移住村落的研究構想。此外，陳秀卿的博士論文主要處理晚清「開山撫番」以來今台河區境的哆囉嘓及大武壠村落發展。參見洪麗完、陳秀卿，〈急水溪上游沿山地區三個哆囉嘓移住村落之比較研究〉，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07年沿山地區研究群工作坊」，2007年7月24-25日，頁1-26；陳秀卿，〈急水溪中上游平埔聚落之比較研究（1875-1945）：以哆囉嘓社、大武壠社移住村落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0）。

活空間；一則溯灣裡溪（今曾文溪）上游北上、往哆囉囑社域移動，筆者已在相關論文分析。<sup>11</sup>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十八世紀中葉南嘉南平原的熟番遭到漢人拓墾壓力時，同樣選擇進入哆囉囑社域東緣丘陵地帶，似乎說明沿山地區具有作為熟番最後基地的特色？熟番他群究竟在哆囉囑社域東側如何展開新生活？其對原住族社哆囉囑人又造成何種影響？哆囉囑社人在其社域內的搬遷，主因漢人勢力膨脹而「被迫」遷徙，蕭壠、蔴荳、大武壠等社離開故鄉，雖亦來自漢人墾殖活動所迫，就其擴散生活空間、抵哆囉囑社域則屬「主動」突破生活領域被壓縮的舉動。那麼一般以清代熟番移動為「被迫遷徙」之舉，主動「擴散」是否可視為其搬遷的另一模式？

本文承接筆者過去對南部平埔族史與沿山邊區社會研究的基礎，<sup>12</sup> 擬從地域史與族群關係史的觀點，以史料、古文書、教會資料及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為主，輔以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以舊社在急水溪中游的哆囉囑社，如何展開其搬遷至上游（即白水溪流域）的行動及各熟番在沿山地區形成主體社會為個案，一方面試圖重建哆囉囑社域限縮暨其社址搬遷的歷史；一方面勾勒明清時期漢人入墾以來，對南嘉南平原熟番生活領域變遷影響的整體面貌。從而分析十八世紀中葉熟番族群出走原鄉的緣由與影響，並考察熟番移住的模式與埔、漢勢力變遷圖像。

文獻上，關於熟番部落生活領域（社域）範圍的紀錄有限，本文主要依古文書與方志資料進行哆囉囑社域的勾勒。有關白水溪流域的哆囉囑社沿山村落的記載亦不多；對其社會的描述，更無直接紀錄。但根據教會留下的地方性資料，與耆老的口述歷史，可作部分面貌的復原。所謂「社域」，亦稱原始地理範圍，指十七世紀臺灣歷史時期以來，文獻資料所呈現、未遭受漢人開墾以前的生活空間。但不包括乾隆年間施行番屯制度時清廷所提供的養贍埔地，<sup>13</sup> 以及乾隆中葉以後

<sup>11</sup> 洪麗完，〈清代楠仔仙溪、荖濃溪流域之生、熟番族群關係（1760-1888）：以「撫番租」為中心〉，頁 1-71；洪麗完，〈婚姻網絡與族群、地域關係之考察：以日治時期大武壠派社裔為例〉，收於戴文鋒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Ⅱ》（臺南：臺南縣政府、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10），頁 77-116。

<sup>12</sup> 參見洪麗完，〈清代楠仔仙溪、荖濃溪流域之生、熟番族群關係（1760-1888）：以「撫番租」為中心〉，頁 1-71；洪麗完，〈婚姻網絡與族群、地域關係之考察：以日治時期大武壠派社裔為例〉，頁 77-116；洪麗完，〈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頁 41-102。此外，若干會議論文正出版、審查中。

<sup>13</sup> 如哆囉囑社的養贍埔地，在彰屬沙歷巴來積積埔地。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152 種，1963），頁 1041-1048。

各社群主動擴散社域外的生活空間。因資料限制，歷史初期以前的族群空間，筆者暫不納入討論範圍。所謂「舊社／本社」乃相對於其後陸續形成的「新社／支社」而言。

## 二、哆囉囑社之原始地理範圍

依荷蘭時期的資料，哆囉囑社被記為 Droko，<sup>14</sup> 即清初文獻紀錄上的「倒咯囑社」、「哆咯囑社」，十八世紀（清康熙末年）以來始稱「哆囉囑社」。<sup>15</sup> 該社為活動於八將溪以南，急水溪中、上游地區的主要村社。<sup>16</sup> 據 1636 年 9 月 5 日，傳教士 R. Junius 給東印度公司的報告，Dorko(哆囉囑)由 Magkinam、Bakloan 兩個村落組成。<sup>17</sup> 1650 年應是荷蘭統治盛期，十七世紀哆囉囑村落的人口數也以此時最多，共有 32 戶、202 人，平均每戶 7 人。<sup>18</sup>

哆囉囑社的原始地理範圍，包括今臺南市白河區（關仔嶺除外）、<sup>19</sup> 後壁區、東山區、柳營區（部分），以及嘉義縣中埔鄉的一部分。<sup>20</sup> 其中除了後壁區位於八將溪南岸的嘉南平原、全境地形平坦外，位在急水溪中、上游的東山區與白河區，其西半部屬於嘉南平原，東半部則在集集竹崎丘陵南端，地形起伏不平。

相較於嘉南平原，集集竹崎丘陵位於臺灣西部平原至中央山脈過渡地帶的狹長區域，全長約 135 公里，平均寬度不超過 12 公里，由眾多交錯溝谷所形成的阻隔形勢，較不適合漢式水田農業活動。<sup>21</sup> 該丘陵北隔大甲溪、接苗栗臺地，南

<sup>14</sup> 中村孝志著，翁佳音、吳密察、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下卷：社會·文化，頁 11。

<sup>15</sup> 陳夢林，《諸羅縣志》（文叢第 141 種，1962；1717 年原刊），卷一：封域志，頁 5：「由哆囉囑社至臺灣界七十六里（以洋仔港為界）。」

<sup>16</sup> 依高拱乾，《臺灣府志》（文叢第 65 種，1960；1696 年原刊），頁 22-23。

<sup>17</sup> R. Junius 著，林偉盛譯，〈R. Junius 給東印度公司的阿姆斯特丹商館諸董事的報告：一六三六·九·五〉，《臺灣文獻》47: 2（1996 年 6 月），頁 69。

<sup>18</sup> 中村孝志著，翁佳音、吳密察、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社會·文化，頁 11。

<sup>19</sup> 關仔嶺為阿里山番固有生活領域，參見本節討論。

<sup>20</sup> 參見林春水，〈白河鎮志（上）〉，《南瀛文獻》3: 3/4（1956 年 6 月），頁 59；另依據乾隆 34 年「哆囉囑社番管業碑」的資料，哆囉囑社的生活領域，北抵今嘉義縣中埔鄉沄水仔。參見本節討論。

<sup>21</sup> 從蕭壠、蔴荳及大武壠等社在哆囉囑社東面集集竹崎丘陵南端落腳、成立村落的地方，及其所經營的土地多屬於旱地、山園可說明。參見林玉茹主編，《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臺南：臺南縣政府文化局，2009），頁 218-225；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文叢第 218 種，1966），第二冊，

以曾文溪毗連內門丘陵。內門丘陵河谷切蝕地表的程度劇烈，具有相當緻密的水系網絡，且佈滿河谷，區內平均高度為 100 公尺左右，局部地區的起伏卻長達 60-80 公尺之間，並不適宜人類活動，地理學上因此稱為「惡地形」。<sup>22</sup>

雖然地形上的限制頗大，集集竹崎丘陵與外界的溝通並未完全斷絕。依十八世紀初，康熙 61 年（1722）藍鼎元在《東征集》對集集竹崎丘陵的描述：

諸羅邑治出郭，南行二十五里至楓子林，皆坦道。稍過則為山蹊。十里至番仔嶺。嶺下為一重溪，仄逕迂迴。連涉十五重溪，則至大埔莊，四面大山環繞，人跡至此止矣。東南有一小路，行二十五里至南寮，可通大武壠，高嶺陡絕。由大山峭壁而上，壁間鑿小洞可容足。如登梯然……。北路山寇捕急，每從此遁大武壠，通羅漢門、阿猴林，而為南中二路之患。<sup>23</sup>

顯示哆囉囑社域東面集集竹崎丘陵，地形上雖然四面環山，往東卻可通往大武壠（玉井盆地）、羅漢門（今高雄市内門區、旗山區）一帶。十八世紀初黃叔瓚《臺海使槎錄》亦載：

自社尾庄、割蘭坡嶺可赴南路，由木岡社、卓猴可赴北路；外此羊腸鳥道，觸處皆通；峻嶺深谷，叢奸最易。土人運灰輦稻，牛車往來，徑路逼狹，不容並軌；惟約晝則自內而外，夜則自外而內，因以無阻。<sup>24</sup>

從居民需避開雙向往來的牛車，說明其路徑狹小、不容並行的情形。

整體而言，地形上哆囉囑社域可分兩部分，即西半部的平原（嘉南平原）與東半部的丘陵區（集集竹崎丘陵）。如表一、二所示，自 1690 年代到十八世紀中葉，哆囉囑社址有過多次變遷，且有由嘉南平原（今東山區）往集集竹崎丘陵地帶（今東山區水雲里、白河區仙草里）逼近的趨勢。就目前所見有限的哆囉囑古文書資料考察，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其生活空間似乎已被侷限於白水溪流域的丘陵區？

〈玉枕火山碧雲寺募為緣業碑記（嘉慶十六年）〉，頁 193-194。有關地形的敘述，參見陳正祥，《臺灣地誌》（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3），中冊，頁 840-855、865-867。

<sup>22</sup> 鍾寶珍，〈惡地上的人與地：田寮鄉民生活方式的形成與內涵〉（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13-27。

<sup>23</sup> 藍鼎元，《東征集》（文叢第 12 種，1958；1722 年原刊），〈紀十八重溪示諸將弁〉，頁 83-84。

<sup>24</sup>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文叢第 4 種，1957；1724 年原刊），頁 8。

表一 清代哆囉囑新、舊社分布情形

類別	新舊社名	地理位置	今地名	(最晚)出現年代	備註
舊社	舊咯社／舊囑社	離府治 120 里	臺南市東山區東山里	1690 年代	漢人入墾並形成新、舊咯庄。
	舊社／倒咯囑社	離府治 130 里；急水溪、囑溪南岸	臺南市東山區東中里	1690 年代	
新社	番社／哆囉囑社	九重溪之南	臺南市東山區東正里	1710 年代	(1) 漢人入墾並形成哆囉囑街(今臺南市東山區東山、東中、東正等村)；同時成立哆囉囑東保、哆囉囑西保。 (2) 大武壠社群、蕭壠社及蔴荳社入墾，並形成大武壠派社、吉貝要(蕭壠社)等。
	新囑社／哆囉囑社	十八重溪北岸	不詳	十八世紀初、中葉	
	番仔厝／哆囉囑社	十八重溪北岸	土地公崎(土牛界址)西北面	十八世紀初、中葉	
	番仔坑／哆囉囑社	十八重溪南岸	坑口東南方山谷；疑臺南市東山區水雲里	十八世紀初、中葉	
	哆囉囑社岩前庄	十八重溪以北(白水溪流域)	臺南市白河區仙草里	最遲 1760 年代	
	哆囉囑社响潭庄				
	白水溪社仔頂庄				

資料來源：洪敏麟、陳漢光、廖漢臣編，《臺灣堡圖集》(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9)，番社圖、店仔口圖；陳夢林，《諸羅縣志》，山川總圖；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文叢第 74 種，1961；1741 年原刊)；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121 種，1962；1764 年原刊)，卷二：規制志，頁 80；戴文鋒主編，《東山鄉志》(臺南：東山鄉公所，2010)，上冊，頁 114、116；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哆囉囑古文書〉，T305D252：002-000、003-000、009-000。

表二 清末古文書所示哆囉囑社群生活領域

社名	契字性質	發生原因	年代	生活領域		
				土名	今地名	地理區
哆囉囑社	典字	乏銀費用	道光 13 年(1833)	木柵庄頭竹園仔東畔	臺南市白河區三榮里	嘉南平原
哆囉囑社	典契字	乏銀費用	光緒元年(1875)	二增坪	臺南市白河區仙草里	集集竹崎丘陵(白水溪流域)
哆囉囑社响潭庄	出全典契字	乏銀費用	光緒 3 年(1877)	白水溪觀音石		
哆囉囑社	出全典契字	乏銀費用	光緒 3 年(1877)	白水溪觀音石		
哆囉囑社	出墾契字	乏銀費用	光緒 7 年(1881)	白水溪二增坪		
哆囉囑社	典契字	乏銀費用	光緒 7 年(1881)	觀音石頂		
哆囉囑社	賣盡根契字	乏銀費用	光緒 9 年(1883)	觀音石豬朝胡口		
哆囉囑社	賣絕盡根契字	乏銀費用	明治 31 年(1898)	白水溪二增坪		
哆囉囑社	開墾字	乏銀費用	明治 33(1900)	觀音石頂二讚坪		
白水溪社仔頂庄	盡根契字	乏銀費用	明治 35 年(1902)	白水溪二增坪		

資料來源：劉澤民、陳文添、顏義芳編譯，《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189 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哆囉囑古文書〉，T305D252：001-000~009-000。



但從表二，道光 13 年（1833）哆囉囑社番婦大哈含彌，因「乏銀費用」，將其祖母開墾的水田（木柵庄頭竹圍仔東畔，今臺南市白河區三榮里），典給附近鳳尾厝莊（今臺南市白河區東中里）漢人蘇快，則說明可能仍有社人未搬遷至白水溪流域或仍有社地留在急水溪中游？本文第三、四節將進一步說明哆囉囑社人生活空間變化並證明清末其侷限於白水溪流域的情形。

### 三、漢人移墾急水溪中游與哆囉囑社址變遷

十七世紀海權時代來臨，荷蘭勢力進入臺灣後，西部平原已非平埔原住民獨自活動的空間。但新移民（殖民者與其引入的漢人）主要聚集新港社域（舊臺南市境），<sup>25</sup> 對哆囉囑原住民的生活空間並未造成重大衝擊。

1660 年代，鄭軍從中國大陸跨海而來，在嚴重缺糧情況下，特別著重墾荒工作。在其攻佔赤崁城（舊臺南市）後，國姓爺鄭成功僅留下少數軍力包圍臺灣城（指安平熱蘭遮城），而將左先鋒十一個鎮的兵力，派到南北各路屯墾開荒。<sup>26</sup> 永曆 16 年（1662），荷人投降後，鄭氏更進一步採取「寓兵於農」的政策；僅以兩旅軍力擔任防務，其餘各鎮按鎮分地，按地開墾。官方除了頒布開墾條例、允許文武各官圈佔土地外，並讓各鎮官兵分撥汛地，鼓勵墾荒。同時，鄭氏王權將荷蘭的王田改為官田，另置私田、營盤田。<sup>27</sup> 雖然鄭成功令諭「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sup>28</sup> 實則各鎮與新移民所墾土地，多半為部落的獵場。按當時清廷為了對付鄭軍，對中國東南實施沿海五省遷界政策，鄭氏則積極召納流亡，鼓勵中國東南沿海的人民移居臺灣，從而補充了臺灣的勞力；於是「閩浙沿海居民附舟師來歸，煙火相接，開闢荒土，盡為膏腴」。<sup>29</sup>

<sup>25</sup> 參見曹永和，〈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收於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83。

<sup>26</sup> 關於鄭氏的開墾情形，參見曹永和，〈鄭氏時代之臺灣墾殖〉，收於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頁 255-293。

<sup>27</sup> 參見程家穎，《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文叢第 184 種，1963），頁 2-3。其中營盤田的賦率已不可考，東嘉生以為或許免稅。參見東嘉生，《臺灣經濟史研究》（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1944），頁 53。

<sup>28</sup> 楊英，《從征實錄》（文叢第 32 種，1958；1662 年原刊），頁 189-190。

<sup>29</sup> 曹永和，〈鄭氏時代之臺灣墾殖〉，頁 273-274。

由於外來移民人口增加後，糧食需求量大，耕地的開闢更為積極。依據永曆 15 年（1661）受鄭成功之命前往北路進行鄭軍屯地測量之荷籍土地測量師的日記：

中國人稱為 Hoem Cangbooiij（茅港尾，在今臺南縣下營鄉）的地方，開始測量第一個領地。經過哆囉囑、諸羅山（今嘉義市）、他里霧（雲林縣斗南）、貓兒干（Bossaccan 在今雲林縣崙背鄉）、虎尾壠（雲林縣褒忠鄉），到達二林（彰化縣二林鎮）。……在那些村裡住有很多中國士兵，每一個將官手下的軍隊約有一千至一千兩百人，他們在山腳以及所有能開墾成水田的土地上，每一、兩百人為一群，很認真地耕種土地，無論年紀多小，全無例外地，都必須種很多蕃薯……村社的外面和裡面，幾乎沒有一個角落沒被耕種，或沒被圍起籬笆來。……連接各村社，經常有人來回走動的鄉村道路也被栽種了。<sup>30</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據此，鄭氏軍民的屯墾工作，以蕭壠社域的茅港尾（在今臺南市下營區境）為第一個領地。其次由南向北依序為哆囉囑、諸羅（舊社在今嘉義市）、他里霧（舊社在今雲林縣斗南鎮）、貓兒干（舊社在今雲林縣崙背鄉）、虎尾壠（舊社疑在今雲林縣褒忠鄉），而止於二林社域（舊社在今彰化縣二林鎮）。屯墾方式是以一、兩百人為一群，在「村社與村社外面的山腳以及所有能開墾成水田的土地上」，包括連接各村社的鄉村道路均被耕墾。可見所謂「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的範圍，可能僅限於部落的村社屋宇與各社已耕墾的土地。<sup>31</sup>（參見本節）

上述，十七世紀中葉，明鄭入臺，自永曆年間開始實施屯田制度。其中在哆囉囑社域內的本協莊（今後壁區嘉苓里）為其屯兵營盤所在；<sup>32</sup> 漢人在哆囉囑社域的墾殖活動，或即開始於此（圖一）。<sup>33</sup> 有關明鄭時代的屯墾資料有限，其對

<sup>30</sup> Phili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in 著、江樹生譯註，《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臺北：漢聲雜誌社，2003），頁 50-51。

<sup>31</sup> 曾品滄認為明鄭拓墾者似未有混圈原住民土地的情形，因為其墾地多分布在蘇荳社、蕭壠社等村落外圍。但從《梅氏日記》的紀錄，卻非如此。參見曾品滄，〈從番社到漢庄：十七至十九世紀麻豆地域的拓墾與市街發展〉，《國史館學術集刊》7（2006 年 3 月），頁 6-7；Phili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in 著、江樹生譯註，《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頁 50-51。另，有關鄭軍的屯墾活動，可參見阮旻錫，《海上見聞錄》（文叢第 24 種，1956；1683 年原刊），卷二，頁 38-39。

<sup>32</sup> 林春水，〈白河鎮志（上）〉，頁 59-60。

<sup>33</sup> 明鄭入臺之初，派荷蘭測量師梅氏進行北路道路的測量，沿途經過茅港尾、哆囉囑、諸羅山，直到二林地區。梅氏目睹許多中國士兵，在原住民村社附近開墾土地、耕種水田。參見阮旻錫，《海上見

哆囉嘓社人生活空間的衝擊如何，並無直接紀錄。入清以來，有關漢人的入墾活動則有較多記載，其對社人的影響也較明顯。

依高拱乾完成於康熙36年（1697）的《臺灣府志》記載：

新舊咯莊（離府治一百二十里）……倒咯嘓社（離府治一百三十里）。<sup>34</sup>

清代將臺灣本地居民分成漢族與非漢族群，<sup>35</sup> 在人群分類外，基於治安上的考慮，漢與非漢族群的居址也有所區分；「(番)社」指非漢民族的村落，漢人村落稱為「莊」。<sup>36</sup> 故所謂「新舊咯莊」，應是漢人在「舊咯社」（今東山區東山里）附近形成的莊落。按歷史初期平埔村社多建立在近水源、草埔又安全的地帶（如舊嘓社臨嘓溪、倒咯嘓社在急水溪南），因此漢人入墾之初也多在其附近落足，<sup>37</sup> 並有不少漢莊名稱依熟番社名命名而來。<sup>38</sup> 另一方面，由《臺灣府志》所記「倒咯嘓社」離府治130里（今東山區東中里），也說明其應為新舊咯（「漢人莊落，離府治120里」）形成後，社人離開舊咯社（舊嘓社）成立的新社，即1690年代《臺灣府志》成書時，已有進入今東山區哆囉嘓生活領域活動的漢人，並已形成某種

聞錄》，卷二，頁38-39；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in 著、江樹生譯註，《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頁50-51。

<sup>34</sup> 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頁37。按：里約為0.5公里。里為東亞傳統的長度單位，又稱「華里」，以與英里區別，實際長度歷代不同。至近代市制的「里」，等於500米／公尺（公制），即0.5公里（公制）。

<sup>35</sup> 過去清廷依統治與餉稅關係，分別臺灣非漢民族為兩種不同的群體，即輸餉、應徭、服教化的「熟番」與清廷政權所不及的「生番」／「野番」。此外，有介於熟番、生番間，只有輸餉但不薙髮、不應徭的「歸化生番」。而所謂「生、熟番」的分類，並非固定的兩群人，隨著他們與官方的關係演變，生、熟番的邊界也有所更動。參見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4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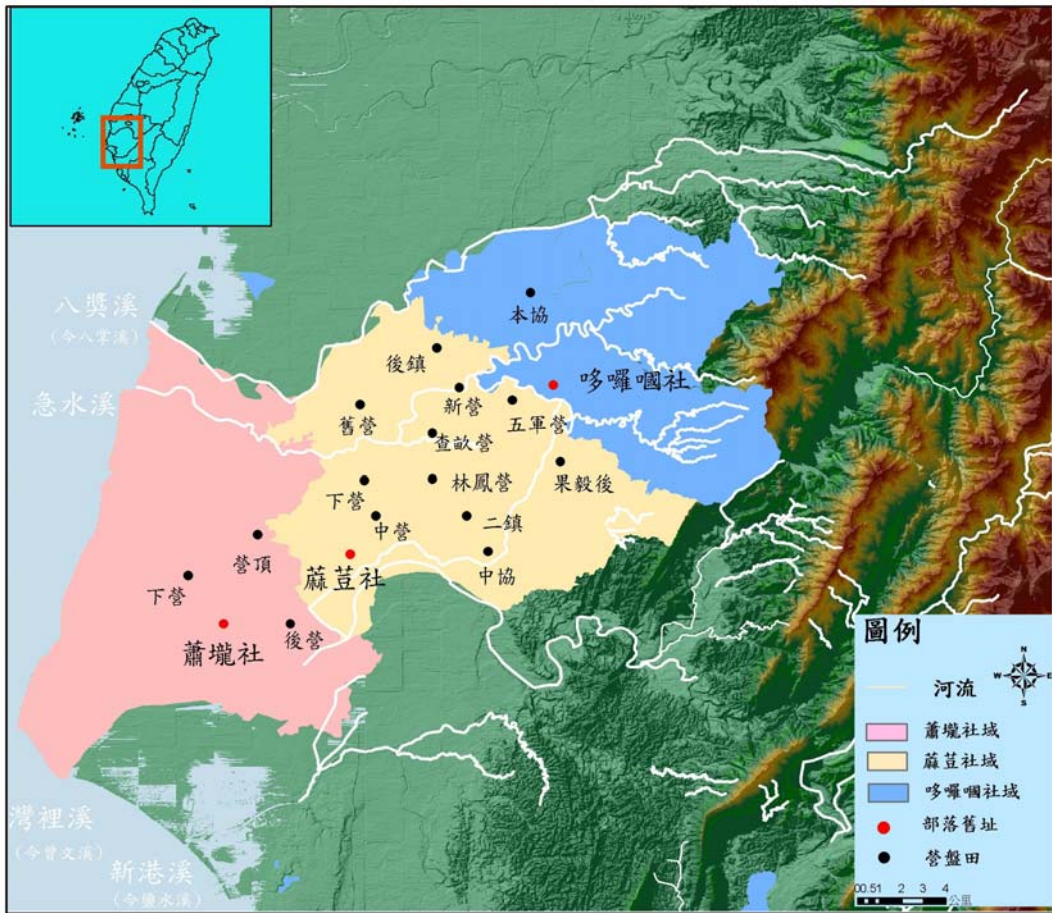
<sup>36</sup> 參見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頁3-116。值得一提者，並非有史以來就如此界定「社」的內涵。在福建，「社」指的是漢人村落；少數民族的村落稱為「洞」。「社」字意義的轉變，可能是在臺灣入清版圖後，才逐漸用來指稱原住民村落，並以「莊」別指漢人村落。換言之，明清之際，「社」並不完全用來指原住民聚落而言。參見李亦園，〈章回小說《平閩十八洞》的民族學研究〉，收於莊英章、潘英海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頁23-41；李國銘，〈文獻上平埔族空白的高雄平原〉，收於氏著，《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研究論文集》，頁113-114。

<sup>37</sup> 無論舊嘓或倒咯嘓社，皆位在急水溪主、支流流經之處，社人日常用水不虞。參見高拱乾，《臺灣府志》，頁22-23。

<sup>38</sup> 此一現象，常見於臺灣較早成立的漢莊名。除了出現不少稱「社口莊」的地名外，也有不少漢莊依部落村社原有名稱而來，如出現在《諸羅縣志》中的半線莊、半線街（以上均在半線社附近）；《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的柴坑仔莊（在柴坑仔社附近）、阿東莊（在阿東社附近）、南北投莊（在南北投社附近）、牛罵新莊（在牛罵〔頭〕社附近）。參見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頁30、32；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五：城池，頁79-85。

規模的村落。

依據較《臺灣府志》晚成書二十年的陳夢林所著《諸羅縣志》（康熙 56 年〔1717〕），出現新嘸莊、舊嘸莊的紀錄，或為十八世紀初，新舊咯莊市街發展結果一分为二，不得而知。由該書記載「哆囉嘸舖 在哆囉嘸社。舖兵三人。新嘸舖 在新嘸莊。舖兵三名。」<sup>39</sup> 則說明新嘸莊、哆囉嘸社為同時、各自存在的獨立村落，均設有舖兵。故新嘸莊應為漢人在新嘸社附近成立的漢人村落；如圖二所示，社人離開新嘸社，可能更往南搬遷。



圖一 明鄭時代屯墾蕭壠社、蔴荳社、哆囉嘸社域

資料來源：根據本文繪成；計畫助理李孟勳協助繪製。

<sup>39</sup> 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頁 30、43。



圖二 清代漢人、熟番遷徙與擴散哆囉囑社域

資料來源：依據本文第二、三節與表一繪製；計畫助理李孟勳、鄭螢憶協助繪製。

說明：1. 本圖植入康熙 61 年的生番界碑與乾隆 25 年的土牛紅線，目的在標示哆囉囑社域東面一度被官方畫出界外，及其與阿里山番生活領域的空間關係。土牛紅線僅屬示意圖，並不盡然可完全表達其真實走向。

2. 康熙 61 年大溪頭（今臺南市後壁區後壁里、嘉苓里）、埔姜林（今嘉義縣中埔鄉義仁村）的界碑，到乾隆年間的土牛界址，移往枕頭山（今臺南市白河區關廟里）、社口（今嘉義縣中埔鄉社口村）。

按十八世紀初，清廷在哆囉嘓社域今後壁區境設有陸路防汛，如在急水溪北岸的下茄冬（今後壁區後壁里、嘉苓里）設北路營把總一員，目兵 85 名；南岸的哆囉嘓（應指舊社附近）因「漢番雜處」，設目兵 8 名，可見設官駐兵乃基於漢人人口成長的管理考慮（兼有監督部落之意）。<sup>40</sup> 而因官方增設相關治安措施，漢人移民的安全獲得進一步保障，更能大事開墾。此外，官方獎勵民間修築水圳，對漢人的開墾活動也有促成作用。依據《諸羅縣志》的紀錄，十八世紀初，嘉南平原有「築堤瀦水灌田」的「陂」34 條，其中由諸羅知縣周鍾瑄捐銀者佔 44.12%（15 條），可見一般。<sup>41</sup>

相對於漢人墾殖成果的累積與勢力的成長，哆囉嘓社人的生活空間日被壓縮，並離開「舊社」（指倒咯嘓社），再遷其南邊、成立新社（新嘓社）；在土地公崎（土牛界址，詳後）西北面現留有地名「番仔厝」（今東山區林安里，新嘓社或成立於附近）可能為新嘓社再次搬遷後形成的居址（詳後）；社人同時也在舊社北邊「番社」（今東山區東正里）聚居。依據《臺灣堡圖集》的資料，<sup>42</sup> 今東山區境東中里有「舊社」地名，應是《臺灣府志》所記倒咯嘓社的舊址。此由陳夢林《諸羅縣志》山川總圖可說明；當時哆囉嘓社被畫在大排竹（今白河區大竹里）之南，其北有嘓溪、急水溪經過。<sup>43</sup>

依據《臺灣府志》記錄：

一曰嘓溪 從大武壠山北，西出大武壠社，過舊嘓之北；又西過開化里之北，稍轉而北，而與急水溪會，入於海。一曰急水溪 從大武壠山北，西過大排竹之南，又過下茄冬，經倒咯嘓之北西迤，而與嘓溪會，同入於海。<sup>44</sup>

則舊嘓應為漢人在舊嘓社舊址附近成立的村落；新嘓莊則相對於舊嘓莊新成立的漢人村落，可能位於新嘓社附近。陳夢林《諸羅縣志》則記載：

曰白水溪，發源於玉案（山名），西灌於大排竹、臭祐、下加冬（俱莊名……）。

<sup>40</sup> 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七：兵防志，頁 119；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八：風俗雜記，頁 119。

<sup>41</sup> 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頁 34-38。

<sup>42</sup> 洪敏麟、陳漢光、廖漢臣編，《臺灣堡圖集》，番社圖。

<sup>43</sup>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2-23；陳夢林，《諸羅縣志》，山川總圖。

<sup>44</sup>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22-23。

曰嘓溪，發源於大武壠（山名）、十八重溪……，合哆囉嘓社北 九重溪（狹淺如十八重）之流，過雙溪口西南，為急水溪（往郡大路。有渡）；……。<sup>45</sup>

急水溪源出於阿里山脈關仔嶺附近之檳榔山，蜿蜒山間。其上游稱「白水溪」，今「白河」區地名由來於此。<sup>46</sup> 其主要支流有：白水溪、九重溪（今六重溪）、十八重溪（今龜重溪）、溫厝廍溪等。<sup>47</sup>

以上兩種志書對急水溪附近景觀的描述，頗為吻合。但《諸羅縣志》指十八世紀初，哆囉嘓社位於九重溪之南，不同於《臺灣府志》所言，舊嘓位處嘓溪南方、倒咯嘓在急水溪之南。簡言之，《臺灣府志》所標示的倒咯嘓社址在流經今東山區、後壁區境之嘓溪南岸；而《諸羅縣志》所標示的哆囉嘓（此後文獻資料都稱哆囉嘓社）則在急水溪支流九重溪之南，可能因生活領域被擠壓的哆囉嘓社人，由倒咯嘓往北搬遷、成立的新社（自稱哆囉嘓社；漢人稱「番社」）。<sup>48</sup>

依據乾隆 29 年（1764）《續修臺灣府志》的紀錄，十八世紀中葉，除了新、舊嘓莊外，漢人也在哆囉嘓的社域形成「哆咯嘓街」，如圖二所示，其範圍包括今東山里的舊咯社／舊嘓、東中里的倒咯囉社／舊社、東正里的哆囉嘓社／番社，<sup>49</sup> 可見隨著漢人墾拓工作的推展，其人口成長快速；人口密集，交易頻繁之地，又形成街市。<sup>50</sup>

從 1760 年代漢人的行政區域保（堡）——哆咯嘓東保、哆咯嘓西保的出現，也可說明漢人勢力發展狀況。<sup>51</sup> 按保的成立表示漢人人數有所增長。換言之，從街、莊、保數的成長，均說明埔、漢勢力變遷狀況。1740 年代社人乃自「番社」

<sup>45</sup> 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頁 15。

<sup>46</sup> 該溪自今白河區以西，過縣道 65 號，至東山區境，匯入六重溪（清代稱九重溪）後，往西行，至新營區，與龜重溪（清代稱十八重溪）合流，再經今北門區，在境內雙春入海。

<sup>47</sup> 參見洪敏麟、陳漢光、廖漢臣編，《臺灣堡圖集》，番社圖、店仔口圖；張雅連，〈大河戀：臺灣重要水系〉，《臺灣月刊》183（1998 年 3 月），頁 4-7。

<sup>48</sup> 2003 年夏天，筆者拜訪紐西蘭奧克蘭（Oakland）毛利人（Mori），獲知因其在奧克蘭市中心的土地值錢，族人因此將房地產等轉給華人，並搬遷較郊外的地區居住的訊息。據此，哆囉嘓的遷徙是否也有類似情形，值得再釐清。

<sup>49</sup>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頁 72-73、87。

<sup>50</sup> 周璽，《彰化縣志》（文叢第 156 種，1962；1830 年原刊），卷二：規制志，頁 39：「凡有市肆者皆曰街；闌闌鬻塵，居處叢雜，人烟稠密，屋宇縱橫。街旁衙衙曰巷。郊野之民，群居萃處者，曰村莊，又曰草地。」

<sup>51</sup>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頁 72-73。

再往南搬遷十八重溪的沿山丘陵地帶（表一）。位在坑口東南方山谷的「番仔坑」（今東山區水雲里），可能為十八世紀中葉社人居址之一。故乾隆 6 年（1741）劉良璧完成《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時，其「諸羅縣圖」將哆囉囑社置於十八重溪南側。<sup>52</sup>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晚劉志二十餘年完成）則指：「哆囉囑社（縣南三十里。近番眾分居社東十八里溪內）」。<sup>53</sup> 所謂「十八里溪內」，簡稱「溪內」，指從坊仔林（今東山區科里里），沿河道至大埔（指前大埔，今東山區東原里、嶺南里），需渡河數次才能抵達。<sup>54</sup>

位在急水溪東南近山地帶的「十八里溪內」，其東側緊鄰今嘉義縣大埔鄉，為界外「剽悍」的阿里山社人活動領域之一（詳下），而急水溪諸多支流上游河道具有曲流特徵（河道蜿蜒如蛇行）、易於氾濫成災，<sup>55</sup> 實非理想的居住環境。可見哆囉囑社在十八重溪的沿山地區另立新社，應與漢人入墾導致其生活領域日蹙有關。雖則當地早在康熙末年已有漢人入墾並形成大埔等客籍村落，前已述及。而從社人搬遷所建新社居址，仍自稱「哆囉囑社」，漢人卻以「番社」、「番仔厝」、「番仔坑」等稱之，說明漢人已成為當地優勢族群，故能以帶有族群意涵的命名方式指稱非漢族群的居址。（參閱第四節）

## 四、漢人、熟番他群移墾沿山丘陵地 與白水溪流域哆囉囑村落之形成

前舉入清以來，由於漢人大量入墾，人口成長快速，漢莊不斷擴張。隨著漢人勢力的膨脹，哆囉囑社人離開本社（舊社），另立新社／支社。此一現象並非獨見於哆囉囑社，也是南嘉南平原熟番普遍的遭遇。他們除了在各自的社域尋找空間、另立新社外，也擴散到社域外的其他地區，如蕭壠、蔴荳兩社於乾隆中葉

<sup>52</sup>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諸羅縣圖，頁 8。

<sup>53</sup> 證之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晚劉志二十餘年完成）的紀錄：「哆囉囑社（縣南三十里。近番眾分居社東十八里溪內）。」所謂十八里溪，指「十八重溪」而言，位在急水溪東南近山地帶。參見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頁 80。

<sup>54</sup> 戴文鋒主編，《東山鄉志》，上冊，頁 117。

<sup>55</sup> 依據林朝榮，〈臺灣中南部之河谷地形〉，收於氏著，《臺灣之河谷地形》（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研究叢刊第 85 種，1966），頁 65-73。



移入十八重溪流域的丘陵地帶。此外，故居在玉井盆地、遭到漢人與熟番他群移墾雙重壓力的大武壠社群，也進入白水溪支流九重溪流域。熟番他群的移墾、定住，影響哆囉嘓社人在白水溪流域生活空間的形成。而康熙末年，漢人已進墾十八重溪內陸，甚至界外阿里山生活領域（關仔嶺山一帶）；往後並不斷發生侵墾社地之事，埔、漢族群關係日益複雜。本節針對漢族、熟番他群移墾活動，暨其對哆囉嘓社人生活空間變遷的影響及哆囉嘓沿山丘陵村落的建立，進行分析。

## （一）漢人、熟番他群之移墾沿山丘陵地

### 1. 漢人移墾活動

本文第三節分析十七、十八世紀初，漢人入墾哆囉嘓社域平原地帶的情形。最晚十八世紀初，漢移民也進駐社域的東面沿山丘陵區。依藍鼎元〈記十八重溪示諸將弁〉：

十八重溪在哆囉嘓之東，去諸羅邑治五十里，……大埔莊，土頗寬曠，旁附以溪背、員潭、崁下、北勢、楓樹岡等小村落。……多潮籍，無土著，或有漳泉人雜其間，猶未及十分之一也。……其田共三十二甲，視內地三百六十餘畝。亦據報聞，無核實清丈。本哆囉嘓社番之業，武舉李貞鎬代番納社餉、招客民墾之者也。<sup>56</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說明1720年代，潮籍大埔縣漢人已在集集竹崎丘陵南端的十八重溪上游老古崎生番界碑西側形成若干客民村落；<sup>57</sup> 大埔莊為其主要村落（圖二）。<sup>58</sup> 而以武舉李貞鎬為首的客籍人士之能入墾哆囉嘓社地，主因代社人輸納社餉。從表二契字資料所示，移住急水溪內陸地區的社人，十九世紀初、中葉以後，典賣土地的理由都與「乏銀費用」有關，且契文都書明需年帶「番租」〔按：納社餉〕，說明清代社餉對社人應是一大負擔。

<sup>56</sup> 參見藍鼎元，《東征集》，〈記十八重溪示諸將弁〉，頁83。

<sup>57</sup> 按清代臺灣行政區劃屬於福建省，因此福建省籍以外的臺灣漢移民皆稱為「客」。其與今日族群分類下的客家人有所出入。但從地名判斷，大埔的漢人移民，應來自中國的嘉應州大埔縣（現改轄於潮州府）的客籍人士。換言之，此處所指的漢移民，行政上不屬於福建省所轄，但為今日族群分類下的「客籍人士」。有關清代方志對「客」的紀錄，相關討論請參見李文良，〈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31（2003年6月），頁141-168。

<sup>58</sup> 乃相對於「後大埔」（今嘉義縣大埔鄉）而言。

除了十八重溪內陸地區外，康熙末年，漢人也越過十八重溪，到達九重溪（康熙 61 年界碑、乾隆 25 年〔1760〕土牛界址所在，詳後），深入北邊界外玉枕山（俗稱枕頭山，乾隆 25 年土牛界所在，詳後）東側遍布高山峻嶺的阿里山脈關仔嶺地區活動；<sup>59</sup> 從陳夢林《諸羅縣志》的紀錄：「關子嶺〔按：關仔嶺〕山（下有漢人耕種其中）」可說明。<sup>60</sup> 依據黃叔璥《臺海使槎錄》的記載：

阿里山離縣治十里許，山廣而深峻。番剽悍，諸羅山、哆咯嚨諸番皆畏之，遇輒引避。<sup>61</sup>

顯示居住在阿里山脈一帶的阿里山番（依現在族群分類，主要為南鄒族）<sup>62</sup> 十分「剽悍」，附近如活動於八將溪北岸的諸羅山社、南岸的哆囉嚨社等熟番都感到害怕，因此寧可迴避之。清代漢人不畏此強悍的山地民族到界外謀生，除了土地的誘因外，應與關仔嶺山的山林資源有關，其間漢人或也擔任平原與內山間交易活動的中介角色，值得未來進一步釐清。

依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資料，清代關仔嶺居民需繳納阿里山番「大社油香租」，<sup>63</sup> 說明其原屬阿里山番的生活領域。直到日治初期，當地漢人居民仍維持繳租的習慣。<sup>64</sup> 油香租的收取方式，主要由各村莊頭人（總理、董事、贖戶）或庄民負責。租額與物品內容，則依照當地農作物與所得多寡定出比例。如大社蔡館（今中埔鄉社口村）向每戶居民收取的物品（額度），包括租谷（從 0.08-7.9

<sup>59</sup> 廣義的「關仔嶺」，指今臺南市白河區仙草里東邊的山區，即枕頭山東麓。

<sup>60</sup> 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頁 10。

<sup>61</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六：番俗六考，頁 121。

<sup>62</sup> 清代所謂「阿里山番」，指阿里山頂四社與下四社（四社生番除外）而言。目前活動於嘉義縣阿里山鄉一帶的各部落，以新美村為界，以北一般稱為北鄒；以南為南鄒。換言之，阿里山番是一集稱。關於「阿里山社」的多重性質及其生活領域，請參見洪麗完，〈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頁 43-58。

<sup>63</sup> 除了油香租外，漢人另有直接繳付阿里山社的「番食租」，以及年度款待阿里山社人的活動。雖然光緒年間劉銘傳的賦稅改革，將具有安撫性質的阿里山番租視為「番大租」（一般土地租賃關係），而採用「減四留六」辦法。清丈後，油香租仍由城隍廟收取，原本作為番食租的部分，則轉由撫墾局徵收。而款待的習俗，直到戰後還持續進行。所謂「減四留六」，指減四成給小租戶作為繳交官方的正供用，留存六成給大租戶。參見〈佐藤少尉ノ蕃租取調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 35-23-12-3（1896），頁 68；洪麗完，〈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頁 67-78。

<sup>64</sup> 參見〈復命書〉（1896.3.28），《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 35-23-12-3（1896），頁 264。

石不等)、龍眼或芋(0.15-3.75元);沔水溪館(今中埔鄉沔水村)主要收取現金(20-150元不等)。<sup>65</sup> 而生產額又與自然環境(水利資源與地利肥瘠)有關,可見沿山界外的土地,兼有水田與旱園。而關仔嶺地區(交沔水溪館)以現金為主,<sup>66</sup> 或與當地環境以經營木材、山產為主有關。此由相關研究,指進入日治時期的關仔嶺地區,已發展為嶺上自給自足的「林業聚落區」、嶺下「溫泉商業區」兩種聚落型態可說明。<sup>67</sup> 從繳交油香租者主要為漢人(而無熟番)則顯示無論經營林業或溫泉商業可能均以漢人為主。<sup>68</sup>

## 2. 熟番他群移墾活動

### (1) 蔴荳社

位於南嘉南平原灣裡溪中游較靠內陸地帶的蔴荳部落,其舊社位在倒風內海之南的公廨埔(今臺南市蔴豆區大埤里蔴豆監理站一帶)。<sup>69</sup> 依據已有的研究成果,明鄭時期漢人墾殖的蔴荳社域,<sup>70</sup> 皆在蔴荳舊社附近;此與前舉一般漢人入

<sup>65</sup> 目前所知,嘉南平原沿山地帶繳交這類番租的村落共有18處,大約分布於今嘉義縣竹崎鄉、中埔鄉、番路鄉與臺南市白河區等,各村落租稅按地理位置就近交給租館,如哆囉囑東下保(今白河區)、嘉義東保部分(今中埔部分地區)等轄區交給沔水溪館;嘉義東保部分轄區(今中埔鄉部分地區、番路鄉)則交給大社寮館。參見〈佐藤少尉ノ蕃租取調報告〉,頁267-268。

<sup>66</sup> 參見〈佐藤少尉ノ蕃租取調報告〉,頁267-268。

<sup>67</sup> 參見朱淑芳,〈關仔嶺聚落的形成與發展:以嶺上林業與嶺下溫泉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頁4、101。

<sup>68</sup> 參見〈佐藤少尉ノ蕃租取調報告〉,頁267-268。

<sup>69</sup> 陳榮輝,〈臺南縣史·平埔族群篇(期末審查報告書)〉(臺南:臺南縣政府委託,2004),頁113。另說在後牛欄(今蔴豆區南勢里),但後牛欄為虞朝社所在,虞朝社可能為蔴荳社乾隆年間的分社。再者,以方位關係來看,大埤里西側有蔴荳口(今蔴豆區蔴口里),亦即蔴荳社的出口,荷蘭人在蔴荳口南方接近蔴荳社處駐軍,即在監督社人動靜。參見盧嘉興、吳新榮纂修,〈臺南縣志:卷一自然志(上)〉,收於吳新榮等主修,《臺南縣志》(臺南:臺南縣政府,1980),第一冊,頁106;以及筆者現地調查所得。

<sup>70</sup> 蔴荳社域,包括今臺南市蔴豆、官田、鹽水、六甲、新營與柳營(部分)、下營(部分)等區。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臺南蔴豆林家土地文書〉, T0359D0296:002-000~006-000、009-000、010-000、012-000、014-000、023-000、108-000;〈臺南蔴豆、佳里地區土地文書〉, T0393D032:0001-000;〈臺南蔴豆林家文書〉, T0411D0336:0001-000~0003-000、0005-000;王世慶蒐輯,〈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二輯第三冊,頁113、114、473、502、520;村上直次郎,《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第二卷第一號:新港文書》(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1933),頁133附錄第七號蔴荳文書、頁136-137附錄第九號蔴荳文書;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臺北:該會,1909),第一卷中冊,頁386-387;林玉茹主編,《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頁46-66;盧嘉興、吳新榮纂修,〈臺南縣志:卷一自然志(上)〉,頁106。

墾之初，基於部落村社舊址多建立在近水源草埔又安全的地帶，因此選擇在舊社附近落足並無二致。目前可考者，包括郭、柯、黃、溫等家族。其中以荷治時期（1648年），郭姓入墾公廨埔南邊的大埕（今麻豆區大埕里）為最早。其他各姓入墾地點也多在蔴荳舊社附近，如柯姓進墾蔴荳（永曆17年〔1663〕，今麻豆區大埕里）；黃姓在公廨埔東方的牛欄（永曆22年〔1668〕）；溫姓在尅祖廟（永曆35年〔1681〕，今麻豆區油車里）開墾。<sup>71</sup>

如圖一所示，明鄭各鎮士兵在蔴荳社域屯墾的營盤田，除了蔴荳舊社附近外，遍佈其社域各角落。目前資料顯示下營（今下營區海墘營）、中營（今下營區中營村、開化村）、林鳳營（今臺南市六甲區中社里、龜港里、菁埔里）、二鎮（今臺南市官田區二鎮里）、中協（今官田區官田里）、查畝營（今柳營區街上）、五軍營（今柳營區重溪里）、果毅後（今柳營區果毅里）、舊營（今臺南市鹽水區舊營里）、後鎮（今臺南市新營區護鎮里）、新營（今新營區中營里）等，均為鄭軍屯墾地。<sup>72</sup>

相對於民間墾殖活動的規模，十七世紀中葉，明鄭官方的墾拓政策，對蔴荳社生活領域的衝擊顯然較大，但目前並無社人從原鄉出走的紀錄。如表三所示，進入清治時期，蔴荳社人不僅在社域內有過多次搬遷，也往社域外遷徙；推測因漢人移墾導致其生活空間被壓縮的情況，到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更加明顯。

依據《諸羅縣志》所記載：

麻豆水窟〔按：掘〕頭，南出灣裡溪墘，北出茅尾港，西出佳里興。漢番雜處之地。目兵二十名。<sup>73</sup>

位在蔴荳舊社公廨埔東方的水堀頭（又稱麻豆港），因漢人入墾、經商，形成番、漢雜處的景象。按此地不僅為荷治時期埔、漢捕撈（荷治時期出贖漁場之一）與舢舨小船、貨物進出的港道，也是南北孔道必經之處，<sup>74</sup> 入清以來，官方並設有

<sup>71</sup> 陳榮輝，〈臺南縣史·平埔族群篇（期末審查報告書）〉，頁113。

<sup>72</sup> 梁茂隆編著，《西拉雅族蔴豆社人》（臺南：蔴豆總爺文史工作室，2000），頁92；盧嘉興、吳新榮纂修，〈臺南縣志：卷一自然志（上）〉，頁106、110-102。

<sup>73</sup> 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七：兵防志，頁120。

<sup>74</sup> 曾品滄，〈從番社到漢庄：十七至十九世紀蔴豆社域的拓墾與市街發展〉，頁12；黃智偉，〈統治之道：清代臺灣的縱貫線〉（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41-42。

表三 明清時期蔴荳新、舊社分布情形

類別	新舊社名	今地名	(最晚)出現年代	備註	
舊社	蔴荳社	臺南市麻豆區大埤里			
新社	蔴荳寮	臺南市下營區境	乾隆 8 年 (1743)		
	社仔	臺南市麻豆區安正里	乾隆 13 年 (1748)		
	社仔	社仔	臺南市官田區社子里	乾隆 29 年 (1764)	
		社子舊社		不詳	在社仔南方
		社仔中社			在社仔西方
		社仔新社			在社仔北方
	虞朝社	臺南市麻豆區南勢里	乾隆 54 年 (1789)		
	番仔溝	臺南市大內區頭社里	疑最遲不晚於十八世紀中葉 <sup>75</sup>		
	埤內社	疑臺南市麻豆區鎮埤頭里	乾隆年間		
	番仔田	臺南市官田區隆本里	乾隆末年	番仔田	
	番仔庄	臺南市鹽水區大庄里	不詳		
	番仔寮	臺南市鹽水區中下里			
	番仔寮	臺南市麻豆區麻口里			
番仔坑	臺南市六甲區王爺里				
中社	臺南市六甲區中社里				

資料來源：洪敏麟、陳漢光、廖漢臣編，《臺灣堡圖集》，拔仔林圖、蔴荳圖、鹽水港圖；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頁 80；盧嘉興、吳新榮纂修，《臺南縣志：卷一自然志（上）》，頁 106；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臺南麻豆林家土地文書〉，T0359D0296:004-000、014-000、023-000。

塘兵與舖遞。而從《諸羅縣志》已出現「麻豆街」的紀錄，顯示十八世紀初漢人移民已在此匯集成一街市的盛況。<sup>76</sup>

依相關研究，指麻豆街位在水堀頭一帶。<sup>77</sup> 筆者認為以漢人入墾之初多選擇在舊社附近（近水源草埔又安全的地帶）落足的經驗法則，「麻豆街」應在「蔴荳社」舊址附近發展而成的漢人街市。漢人若在水路交通便捷的水堀頭發展街市，顯然無須以「麻豆」為街名。無論麻豆街位於何處，當漢人勢力相對膨漲後，蔴荳社人的生活領域必然遭到壓縮。依據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的資料：「縣西南六十里。近番眾分居社東中協庄後，距舊社十二里」，<sup>78</sup> 主要描述十八世紀中葉，社人在蔴荳舊社東方另擇居址的情形。

<sup>75</sup> 參見村上直次郎，《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第二卷第一號：新港文書》，頁 34-135，附錄第八號文書，及本文討論。

<sup>76</sup> 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頁 32。

<sup>77</sup> 曾品滄，〈從番社到漢庄：十七至十九世紀麻豆社域的拓墾與市街發展〉，頁 12-13。

<sup>78</sup>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頁 80。

如表三所示，乾隆初年以來，蔴荳社人另在社域邊境今下營、鹽水、六甲，甚至社域外今大內成立新社／支社。其中乾隆 22 年（1757），蔴荳社番因「乏銀別置」，杜賣二重橋（疑今大內區二西里、曲溪里，原大武壠社群故居）的資料，說明十八世紀中葉，蔴荳社人可能已東向往社域外的沿山丘陵區移動。<sup>79</sup>

除了進入大武壠社域移墾外，蔴荳社人可能也往東北方的哆囉囑社域前進。依據目前所見古文書資料，蔴荳社業主陳國興（也是該社通事）於乾隆 60 年（1795），因前佃黃義退耕，將其買來的茄苳坑（枷柎坑）山二湖、三贊湖（以上在今東山區水雲里）再招新佃曾振生開墾；任其再種「菓子、什物」，年納餉銀各 1 及 0.5「員」，「永付」佃人為「己業」。<sup>80</sup> 茄苳坑山在哆囉囑社域的十八里溪內，可見十八世紀末蔴荳社人已往哆囉囑社的沿山丘陵發展。從其設有「通事」管理社務，說明移住活動應有一定的人口規模參與。由茄苳坑山只能種植菓子、什物等耐旱作物，顯示其墾拓之地地形不平外，可能地利不佳。而蔴荳社業主將原先自哆囉囑社買來的產業招佃開墾，主要希望佃人代納餉銀，顯見離開故居的熟番仍需負擔社餉。<sup>81</sup>

蔴荳社人另在蔴埔有「蔴荳社業主陳國興」名下的產業。<sup>82</sup> 蔴埔指今柳營區旭山里的丘陵地，位於現臺南尖山埤水庫第三號觀音埤後面。今日仍有蔴荳社裔聚居當地。<sup>83</sup> 而蔴荳社業主陳國興在茄苳坑山的土地，似與蕭壠社段姓業主共有產權，<sup>84</sup> 兩者間的關係究竟為何？不得而知。據此，卻可說明蕭壠社也進入哆囉囑社地尋找生機。（圖三）

<sup>79</sup> 村上直次郎，《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第二卷第一號：新港文書》，頁 34-135，附錄第八號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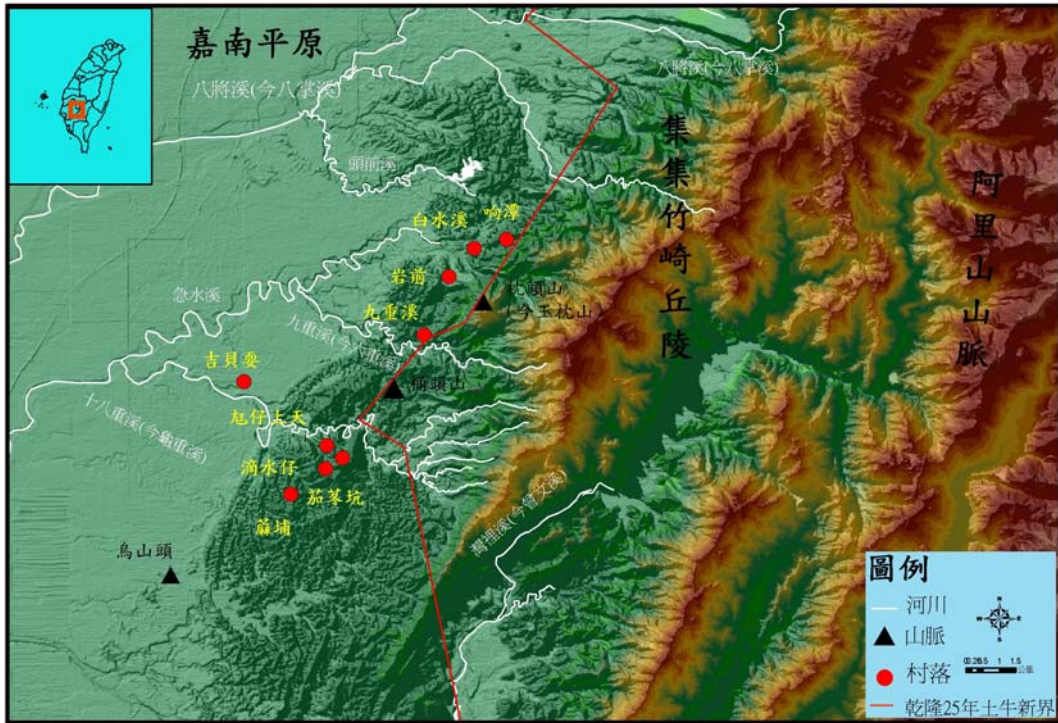
<sup>80</sup> 參見林玉茹主編，《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頁 214。

<sup>81</sup> 此與施添福的「國家剝削」促使熟番出走故居的主張有所出入。參見施添福，〈清代臺灣岸裡地域的族群轉變〉，收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 301-332。

<sup>82</sup> 參見林玉茹主編，《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頁 215 印記「蔴埔業主、蔴荳社通事陳國興記」，說明陳國興既是蔴荳社通事，也兼蔴埔業主身分。

<sup>83</sup> 依筆者田野調查所得（2005 年 10 月 15 日），位於臺南尖山埤水庫的江南渡假村（今臺南市柳營區旭山里 60 號）第三號觀音埤後面，仍有民眾口中的「番仔」居住；雖然蔴埔同時有蕭壠社、蔴荳社人經營的土地，從地緣上（臨近蔴荳社域）推估，應為蔴荳社裔移居地（蕭壠社在哆囉囑社域成立吉貝耍村落，圖二）。

<sup>84</sup> 從兩社在「枷柎坑」的土地契字上同時具名，可能關係匪淺，值得未來再釐清。參見林玉茹主編，《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頁 66。



圖三 急水溪上游地形與十八世紀中葉熟番拓墾村落

資料來源：根據本文第三、四節內容繪成；計畫助理李孟勳、鄭瑩憶協助繪製。

## (2) 蕭壠社

前舉明鄭入臺，因米糧問題，積極實施屯田制度。就目前已有資料，其在灣裡溪下游設置的屯營，在蕭壠社域<sup>85</sup>者，至少有以下營（今臺南市佳里區下廊里、頂廊里）、營頂（今佳里區營頂里）、後營（今佳里區後營里、營西里）等。<sup>86</sup>如圖一所示，相對於蔴荳社的屯墾活動，明鄭軍民在蕭壠社域進行的規模較小，或

<sup>85</sup> 明清時期，蕭壠社域主要在今臺南市佳里、學甲、將軍、七股、西港、安定（部分）、柳營（部分）、下營（部分）等區境。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臺南麻豆、佳里地區土地文書〉，T0393D032：0004-000、0007-000、0008-000、0010-000、0022-000；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臺北：該局，1904），上卷，頁 252、371；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一卷中冊，頁 383、384-385；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頁 16；盧嘉興、吳新榮纂修，〈臺南縣志：卷一自然志（上）〉，頁 107；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99；洪敏麟、陳漢光、廖漢臣編，《臺灣堡圖集》，蕭壠圖；石萬壽，《臺灣的拜壺民族》，頁 74。

<sup>86</sup> 盧嘉興、吳新榮纂修，〈臺南縣志：卷一自然志（上）〉，頁 107-108。

與其偏處沿海地帶有關係。目前並無相關資料可說明屯墾造成蕭壠社人他遷社域外的現象。

入清以來，在過去的屯墾基礎上，漢人更大規模入墾，人口成長快速，漢莊不斷擴張。依清代方志（《續修臺灣府志》）的紀錄：「西港仔街……濱海民番貿易」；<sup>87</sup> 據此，十八世紀中葉，位於蕭壠社域西南方臺江內海的叉港西港仔（今臺南市西港區西港里），已成為埔、漢交易的地方，推測漢人勢力已由灣裡溪的平原地帶往濱海地區擴張。

隨著漢人勢力的膨脹，蕭壠社人因而離開本社（即蕭壠舊社），另立新社。如表四所示，蕭壠舊社即蕭壠社南勢（今佳里區建南里）。康熙年間出現的歐汪社、史椰甲社，乾隆年間的學甲社、佳里興社、桔根要莊、吉貝要莊，與形成年代不詳的番子藪、篤加、番仔塢、社內等新社／支社，有些或同時存在，有待釐清。而依據道光 28 年（1848）為了出讓潭乾角（今佳里區三協里）宅地，訂立買賣契約的雙方，分別稱「蕭壠社」李江、「蕭壠庄」楊葵，基於清代臺灣的「莊」、「社」為漢人、部落居址，李江自稱「蕭壠社」人，說明立契時可能部分社人仍留居舊址。換言之，蕭壠人的遷徙並非廢社他遷。<sup>88</sup>

蕭壠舊社北方的佳里興社（今佳里區佳化里），<sup>89</sup> 入清以後，官方在其社域設諸羅縣衙、北路參將營。<sup>90</sup> 漢移民安全獲得保護，拓墾事業更順利進展。最晚至乾隆中葉，漢人村落「佳里興庄」已形成。<sup>91</sup> 如表四所示，佳里興之北、灣裡溪東面的營頂社（在今佳里區營頂里），出現於乾隆初年。可能因水路位置重要，明鄭時代當地設有屯兵處所，前已述及。日治時期營頂、溪洲納入舊大字溪洲庄的行政區。溪洲位於今佳里區舊曾文溪故道東側、佳里興北面；顧名思義，其因鄰近溪流、地勢相對較低而得名。營頂的位置偏在溪洲的東方，乾隆初年佳里興社人選擇在營頂附近成立新社，並以漢莊（營頂）為社名（營頂社），一則顯示

<sup>87</sup>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志，頁 87。

<sup>88</sup> 參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一卷中冊，頁 383。

<sup>89</sup> 佳里興社的社域範圍，包括佳里區、將軍區在內。參閱註 85。

<sup>90</sup> 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頁 30；卷四：武備志，頁 71。

<sup>91</sup> 依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臺南麻豆、佳里地區土地文書〉，T0393D032：0010-000，嘉慶 8 年佳里興庄呂旺等出讓祖父開墾的宅地，以一世代 20 年計算，呂旺祖父約在 1760 年代的乾隆中葉開墾佳里興庄的土地。



其成立時間在漢莊形成之後，<sup>92</sup> 一則說明社人選擇這類地勢相對較低(易有水患)之處，再建新社，可能與漢人壓縮其生活空間有關。換言之，漢人進入佳里興庄定居時間應早於乾隆初年，隨著其勢力發展，社人不得不另覓生活空間。

表四 明清時期蕭壠新、舊社分布情形

類別	新舊社名		今地名	(最晚)出現年代	備註	
舊社	蕭壠社南勢		臺南市佳里區建南里			
新社	歐汪社	歐汪社	臺南市將軍區忠興里	康熙 23 年 (1684)	社仔可能為歐汪社新社	
		社仔	臺南市將軍區北埔里	不詳		
	史椰甲社		將軍區廣山里、玉山里	康熙 56 年 (1717)		
	學甲社	學甲社	臺南市學甲區境	不詳	乾隆 8 年 (1743)	後社、中社、下社仔疑為學甲社分社
		後社				
		中社				
		下社仔				
	佳里興社	佳里興社	本社東勢 本社西勢	臺南市佳里區佳化里	乾隆 23 年 (1758)	營頂社、番子厝為佳里興社新社
		營頂社				
		番子厝	臺南市將軍區西河里	不詳		
	桔根要莊		不詳	乾隆 29 年 (1764)		
	吉貝要莊		臺南市東山區東和里	乾隆 29 年 (1764) 以後		
	番子寮		臺南市佳里區海澄里、漳州里	不詳		北頭洋在海澄里
篤加		臺南市七股區篤加里				
番仔塢						在篤加東南二里處
社內		臺南市下營區茅尾里	不詳			

資料來源：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頁 16；盧嘉興、吳新榮纂修，〈臺南縣志：卷一自然志（上）〉，頁 107；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99；洪敏麟、陳漢光、廖漢臣編，《臺灣堡圖集》，蕭壠圖；石萬壽，《臺灣的拜壺民族》，頁 74；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臺南麻豆、佳里地區土地文書〉，T0393D0321：0004-000、0008-000；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一卷中冊，頁 383。

<sup>92</sup> 按平埔新社形成時，若附近已有漢人村落，社人移居後往往以漢莊為新社名，故有以莊名為社名的現象。如中部臺灣的萬斗六社（乾隆 55 年實施番屯制度後成立）位於萬斗六莊（最遲乾隆 30 年已形成）旁。黃仔坑社則因柴仔坑社人在黃竹坑隘口守隘，於嘉道年間形成。參見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第二冊（下），頁 116-118；周璽，《彰化縣志》，卷六：田賦志，頁 167；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會社，1910），頁 82；劉澤民，〈從古文書看清代柴坑社與黃竹坑社之關係〉，《臺灣文獻》別冊 4（2003 年 3 月），頁 15-18；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臺南麻豆、佳里地區土地文書〉，T0393D032：0008-000。

從表四所示，康熙年間以來，特別是乾隆時期，蕭壠社人有往臺江內海（今七股、將軍等區）濱海地區移動的趨勢，雖然番子寮、篤加、番仔塢等成立時間不詳，由其地理位置均偏處蕭壠社域西面近海地區，似可說明蕭壠社人在較不適合漢人耕墾之社地另立新社，乃漢人勢力發展結果。其成立時間，應在乾隆年間或稍後。換言之，社域中位置較近河流、海域低窪之地，乾隆年間以來仍為社人活動的空間，可能與當地並非漢人首要選擇之處有關。另一方面（最晚乾隆 29 年）社人也北上、沿急水溪越過蔴荳社域，長程搬遷、進入哆囉囑社域擴散其生活空間。（圖三）

依據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載：

蕭壠社（縣西七十里。近番眾分居社東桔根要莊，距舊社十五里）。<sup>93</sup>

可見十八世紀中葉，部分蕭壠社人分居在離蕭壠舊社 15 里處的「社東桔根要莊」；桔根要莊原址何處不得而知，<sup>94</sup> 後來再遷十八重溪北岸的吉貝要莊（今東山區東河里）。

前舉十八世紀初、中葉，哆囉囑新社／支社分散在九重溪之南（番社）、十八里溪內（番仔坑、番仔厝）及其西側（新囑社）；1760 年代以後，蕭壠社人可能沿急水溪移入，並選擇定住十八里溪內西側的吉貝要莊（新囑社可能在附近）。依據在岩前莊（今白河區仙草里）發現的乾隆 34 年（1769）「哆囉囑社番管業碑」所示，<sup>95</sup> 哆囉囑社人最晚於 1760 年代往北、向今白河區更內陸的沿山地帶移動。其中部分社人選擇留居吉貝要莊（如向、毛、許、葉等姓）。<sup>96</sup> 由契字資料所示，吉貝要莊的蕭壠社人，從嘉慶 19 年（1814）起，到光緒 13 年（1887），

<sup>93</sup>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志，頁 80。

<sup>94</sup> 石萬壽認為應在今蔴荳區西南方番仔寮。參見石萬壽，《臺灣的拜壺民族》，頁 76。

<sup>95</sup> 參見張溪南等撰，《白河鎮志》（臺南：白河鎮公所，1998），頁 395。

<sup>96</sup> 根據相關研究，吉貝要聚落有哆囉囑與蕭壠兩社人共同居住的事實，並形成集村的型態。居民中的向、毛、許、葉等姓氏，均為哆囉囑社人；在甘為霖牧師傳教過程中，其與移住白水溪、岩前的哆囉囑人，同樣放棄傳統信仰、改信基督教。另外，段姓至今仍為吉貝要蕭壠後裔的大姓。雖然吉貝要、白水溪和岩前等地的熟番有信仰上的差異，清末以來，彼此間因婚姻關係所形成的親屬網絡卻相當密切。參見陸文照，〈吉貝要（Kapas-au）聚落之研究（1904-1976）〉（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 3-19。另，依據前臺南縣白河鎮戶政事務所提供，〈本籍戶口調查簿〉，0001~0049、〈本籍除戶簿〉，0050~0129，共 137 冊；岩前教會藏，〈洗禮簿（成人姓名簿）〉等資料，有吉貝要教友因婚姻關係遷入岩前教會。

由段姓蔴埔業主與佃人訂立的「山批字」、「墾字」等，包括十八里溪內的厝仔上天山內、大坵埔山、塗城坵，及滴水仔庄崎頭（以上在今東山區澗水里）等地，在收取「山批銀」、「墾銀」外，佃人均需另付少許「山租銀」。<sup>97</sup> 十八里溪內既是哆囉囑社域範圍，筆者推論該微量的「山租銀」，可能作為交付原始土地所有人哆囉囑社的補償。而直到日治時期，哆囉囑社人仍向吉貝要的蕭壠社人收取番租，進一步證明兩社間存在的土地關係。<sup>98</sup>

### (3) 大武壠社群

前舉十八世紀初、中葉，哆囉囑社人主要聚居在九重溪南、十八重河流域；乾隆 14 年（1749），諸羅知縣周芬斗「哆咯囑詩」的紀錄：「十八重溪外九重。山環水複草蒙茸。既知族類臻饒裕。秫酒清過漢釀濃。」<sup>99</sup> 可見九重溪（溪名）一帶，當時仍為哆囉囑社人的生活空間。然而最晚 1760 年代，哆囉囑社人已越過九重溪，北向白水河流域更內陸沿山丘陵地帶移動，推測與大武壠社群的移入有關。<sup>100</sup> 如圖二所示，大武壠社群在九重溪一帶建立村落，應與其自大武壠（玉井盆地）溯灣裡溪而上的動線有關。<sup>101</sup>

<sup>97</sup> 參見林玉茹主編，《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頁 218-225。

<sup>98</sup> 參見張溪南等撰，《白河鎮志》，頁 396。

<sup>99</sup> 參見周芬斗，〈留題諸羅十一番社〉，收於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十六：藝文（七），頁 955。

<sup>100</sup> 依據筆者的研究，大武壠社群移住哆囉囑社域，約在十八世紀 40 年代末與 70 年代末之間。參見洪麗完，〈婚姻網絡與族群、地域關係之考察：以日治時期大武壠派社裔為例〉，頁 100-102。

<sup>101</sup> 灣裡溪支流大埔溪、後堀溪會流的玉井盆地，在內門丘陵的西面，鄰接嘉南平原，為大武壠社群的故居（大約在今臺南市玉井、楠西〔龜丹庄除外，為阿里山生活領域〕兩區，並及南化、大內、左鎮等區境）。參見劉澤民編著，《平埔百社古文書》（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頁 364、367、370、377、379；劉澤民、陳文添、顏義芳編譯，《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頁 188 上、190；曾振銘、童元昭主編，《噶瑪蘭西拉雅古文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999），頁 82-91、94-99、102-109；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中卷，頁 548；村上直次郎，《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第二卷第一號：新港文書》，頁 138-139，附錄第 10 號大武壠文書；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上卷，頁 205-206、251-252；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中卷，頁 258-259；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一卷上冊，頁 255-260、第二卷上冊，頁 60-64；劉澤民編，《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續編》（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上冊，頁 190、下冊，頁 653、671 及 672 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臺南蔡自記土地文書〉，T0230D0201：0030-000；〈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文書契約·永久保存公文類纂〉，〈楠梓仙溪西里龜丹庄地番四〇之二〉、〈楠梓仙溪西里龜丹庄一〇之四、一二之一、一二之二〉，編號：od-ta\_02161\_000165-0001-u.doc、od-ta\_02161\_000159-0001-u.doc（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下載日期：2009 年 11 月 15 日，網址：<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另，據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頁 98 記載：大匏崙渡、龍蛟瀨渡、走馬瀨渡（以上在大內區境）均在大

十八世紀中葉，當大武壠社群進入九重溪一帶定住，蕭、蔴兩社可能已在十八重溪流域落足。依乾隆 44 年（1779）臺灣北部理番同知史崧壽所立「哆咯囉大武壠番租碑記」記錄：

「啟等番佃耕種社番田園，俱照督憲行清之案，每甲旱田斷貼番租三石七斗、定租一石六斗，……。」……哆咯囉、大武壠派二社通土、社番、佃戶人等知悉……。<sup>102</sup>

據此，1770 年代，大武壠派社與哆囉囉社既列名於同一碑文中，且兩者似乎均以業主身分與漢佃存在土地關係，說明他們在九重溪活動可能已有一段時間。

就地形而言，九重溪流域帶有顯著之掘鑿曲流橫斷的地形特徵。其四面為丘陵所環繞，土質以旱園為主，<sup>103</sup> 居民主要以種植龍眼、棧仔等旱園作物維生（現多種植菓樹）；清代交通不便，人群往來全賴崎嶇的山路，<sup>104</sup> 說明大武壠社群的墾地並不比十八里溪內蕭、蔴的墾地佳，同為非優良的生活環境。<sup>105</sup> 可見其移墾、再建新社，應與原鄉生活領域日蹙有關。關於其移住原因、在哆囉囉社域形成的五個小村落，及其對外以「大武壠派社」為集體稱呼，筆者已有專文分析，茲不贅述。<sup>106</sup>

如上所述，十七世紀外力入殖嘉南平原以來，對原住民的生活產生莫大衝擊。但真正讓熟番族群面臨存亡問題並需另闢生活空間的壓力，主要來自清代以來大量漢人農墾移民的土地需求。如本文分析，蔴荳、蕭壠及大武壠等社群移住

---

武壠，前者是乾隆 6 年知縣何衢詳令歸大武壠頭社番設渡濟人；後兩者則歸大武壠二社番設渡濟人。據此，今大內區應為大武壠頭社、二社的生活領域，官方才作如此分派。

<sup>102</sup> 該碑現存東山區東山里東山警察派出所。參見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第四冊，頁 410-412。

<sup>103</sup> 從嘉慶 16 年，漢人為了在大武壠派社居址北方山上建觀音廟「火山碧雲寺」（今白河區關嶺里），由廟方向大武壠派社番婦斗鴿加弄承購其在七重坑口（在六重溪上游七重溪附近）、番目京龜勿等在六重溪溪口的荒埔園可說明。參見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第二冊，〈玉枕火山碧雲寺募為緣業碑記（嘉慶十六年）〉，頁 193-194。

<sup>104</sup> 九重溪位於大埔莊北邊，大埔莊四周為大山環繞的情形，本文第二節已述及。2010 年 2 月 22-23 日農曆年底，筆者參與今臺南市東山區碧軒寺觀音媽回白河區碧雲寺過年，舊曆年初再返回本寺（碧軒寺）的遶境活動，即由仙草埔，循山路，進入九重溪大武壠派社村落，到東山街區。

<sup>105</sup> 參見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第二冊，〈玉枕火山碧雲寺募為緣業碑記（嘉慶十六年）〉，頁 193-194。

<sup>106</sup> 參見洪麗完，〈清代楠仔仙溪、荖濃溪流域之生、熟番族群關係（1760-1888）：以「撫番租」為中心〉，頁 1-71；洪麗完，〈婚姻網絡與族群、地域關係之考察：以日治時期大武壠派社番為例〉，頁 77-116。

哆囉嘓社域的背景，涉及漢人拓墾活動；大武壠社群尚與熟番他群的移入有關。其中蕭壠社自灣裡溪下游北上，進入急水溪上游，形成吉貝要莊，並耕墾於十八里溪內的山坡地；蔴荳社聚居十八里溪內的蔴埔，並入墾山坡地（可能與蕭壠社聯手）；大武壠社群則溯灣裡溪而上、進入檳榔山西側九重溪流域。即哆囉嘓社故地十八里溪內及九重溪一帶的空間，成為熟番他群的新故鄉。同時，由於漢人勢力擴充，十八世紀初、中葉漸次退出急水溪中游平原的哆囉嘓社人，先是往南、落足於十八里溪內。十八世紀中葉，因各熟番他群入墾，再遷九重溪以北的沿山社域。此後哆囉嘓社的生活空間逐漸侷限在白水溪流域。換言之，哆囉嘓社人的搬遷行動涉及漢人與熟番他群的墾拓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移墾哆囉嘓社域的蕭壠社、蔴荳社，最初可能皆以繳租的方式取得土地。此與往後其土地再移轉於漢人的經營方式，皆源自漢人的土地經營理念。然而長期受到漢人生活經驗影響的熟番，一般私有土地觀念已普遍，蕭、蔴卻由「業主」代表處理相關土地業務，是否表示其仍受部落傳統集體概念的影響？<sup>107</sup> 值得未來再釐清。其次，哆囉嘓社人與各社在白水溪流域的生活空間，如圖二所示，大部分位於康熙年間的界碑外，小部分在乾隆年間土牛界東側。國家的族群隔離政策究竟對熟番遷居沿山地帶有何推或阻的作用？本文將進一步分析。

## （二）番界與白水溪流域之生活空間

### 1. 由「界外」到「界內」

康熙 61 年，朱一貴之亂後，基於治安考慮，官方首度在沿山地帶「豎石立界」。<sup>108</sup> 其中，從哆囉嘓九重溪（溪名），沿老古崎（今東山區嶺南里）、土地公崎（今東山區林安里）、下茄冬大溪頭（今後壁區後壁里、嘉苓里），經諸

<sup>107</sup> 有關部落集體概念，可由農作、捕鹿與捕魚活動說明：(1) 關於農作：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文叢第 90 種，1961；1747 年原刊），頁 2：「七月成熟。集通社圖定日期，以次輪穫。及期，各家皆自鑿牲酒以祭神，遂率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鎌鉞。歸即相勞以酒，酌陶醺醺，慶豐收焉。」(2) 關於捕鹿：杜臻，《澎湖臺灣紀略》（文叢第 104 種，1961；1684 年原刊），頁 6：「其捕鹿，嘗以冬；伺其群出，乃集眾逐而圍之。」(3) 關於捕魚：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六：番俗六考，頁 104 云：「番婦或十餘、或數十於溪中用竹籠套於右膝，眾番持竹竿從上游馭魚，番婦齊起齊落，扣魚籠內，以手取之。」

<sup>108</sup>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五：番俗六考，頁 112。

羅山埔姜林（今中埔鄉義仁村）、白望埔（白芒埔，今中埔鄉同仁村）一線，通過哆囉嘓社域東面，以東地區均劃為界外生番的地域範圍。<sup>109</sup> 所謂界外生番指阿里山社而言，前已述及。

往後因各移民（埔、漢）不斷進入界外地區，<sup>110</sup> 乾隆年間屢經官方整頓，番界往東移動。依乾隆 25 年「清乾隆中葉番界圖」所示，<sup>111</sup> 原在今後壁區的大溪頭界碑，東移到今白河區關仔嶺前的玉枕山麓；原在今中埔鄉義仁村的埔姜林界碑，移同鄉社口村。如圖二所示，康熙 61 年官方劃為界外的沿山邊境，往東推移；從社口到枕頭山、九重溪、土地公崎、老古崎以西的範圍，亦納入國家版圖。因此，乾隆 34 年埔、漢發生仙草埔（今白河區仙草里）的土地爭執（原在界碑以東），熟番在無法自保的狀況下，得以透過通（事）土（官）眉八稀等向諸羅知縣求助，並獲得官府統治力量的保護。

依據乾隆 34 年「哆囉嘓社番管業碑」的紀錄：

據哆囉嘓社番通土眉八稀等呈仙草埔地被武生李必秀佔收一案，……東至玉枕山大嶺，西至雙叉路，南至糞箕湖，北至溫水溪等……。<sup>112</sup>

說明 1760 年代，漢人武生李必秀因佔墾白水溪沿山地區的先草埔（仙草埔）地，與哆囉嘓社人發生嚴重的土地糾紛。武生李必秀究竟與康熙末年開墾十八重溪流域的武舉人李貞鎬有無關係？先草埔土地糾紛是否為李氏家族由南往北推進墾務的結果？值得未來再釐清。

如碑文所示，經由官方認可的哆囉嘓社域範圍：（1）東到今白河區東方玉枕山一帶（乾隆 25 年的土牛新界），（2）西到雙叉路，（3）南至漢人村落糞箕湖（今白河區河東里），（4）北至溫水溪；以閩南語發音，應即澆水溪，土名沘水仔（今

<sup>109</sup>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八：番俗雜記，頁 167。另，埔姜林番界碑原在今中埔鄉義仁村，後移同鄉社口村。陳美鈴認為社口村（現改為隆興村）石山店的番漢界碑為康熙 61 年的界碑，從石山店位於忠王祠前阿里山公路旁，及吳鳳被殺地點今義仁村位在社口村西側判斷，石山店的番漢界碑應為漢人入墾後移動的結果。參閱施添福總編纂、陳國川編纂、陳美鈴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八：嘉義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下冊，頁 584-585、589-590。

<sup>110</sup> 如十八世紀初，已有少數漢人冒險越界，在關仔嶺山下方開墾。另，由武舉人李貞鎬代番納餉、開墾十八里溪內的大埔庄，其地點在界碑附近，若往界外推移並非不可能。參見本文討論。

<sup>111</sup> 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乾隆中葉番界圖」，善本室 A909.2232.704。

<sup>112</sup> 參見張溪南等撰，《白河鎮志》，頁 395。

嘉義縣中埔鄉澗〔沄〕水村），原屬阿里山番生活領域，清代發展為漢人村落，前已述及。<sup>113</sup> 換言之，介於沄水溪與岩前之間、東到土牛界為止的「仙草埔」，判為哆囉嘓社地範圍。令人好奇的是，官方何以作如此判決？

前舉嘉南平原東側原屬清代阿里山番生活領域，如沄水仔、關仔嶺山等地，移墾漢人以繳納大社油香租的方式取得土地。而白水溪流域的哆囉嘓社村落响潭、白水溪、岩前及南方的坑內，坑內南邊的大武壠派社村落石廟、六重溪、頂埔、炭下仔、九重溪（檳榔腳）等，大約從關仔嶺以西、沄水仔以南地帶，均無繳交阿里山番租的紀錄，則說明其不屬於阿里山番的生活領域範圍。由目前白水溪流域所見土地資料，主要為熟番、漢人間進行土地租賃、買賣的契約，<sup>114</sup> 也證明其非阿里山社的生活領域。（圖二）

上述，白水溪流域可能原為哆囉嘓社人的狩獵區域（與阿里山社傳統生活領域交錯），因官方施行族群隔離政策，成為「界外」之地。<sup>115</sup> 十八世紀中葉，哆囉嘓社人搬遷時，因乾隆年間重新清釐邊界，再由「界外」變成「界內」社地。其南的九重溪生番界碑位置維持不變，理論上其仍為界外生番地，但已為大武壠派社的生活空間（實際上如圖所示，五個小村落可能分別落在邊界內外）。從大武壠派社被納入乾隆末年的番屯中，說明官方可能已將九重溪界外地納入國家管理的範圍。<sup>116</sup> 因此，官方在判定仙草埔地紛爭時，將南到漢人村落糞箕湖的地帶判為哆囉嘓社所有，而將九重溪除外。換言之，由於公權力介入埔、漢雙方土地的紛爭，哆囉嘓社不僅得以保護其社地，其與阿里山番、大武壠派社的邊界，可能也因此獲得進一步確認。

## 2. 埔、漢錯雜而以熟番為主體之社會

如前所述，南嘉南平原遭到漢人墾殖壓力的熟番，不約而同於乾隆中葉往社域外擴散，並選擇在哆囉嘓社沿山丘陵的社地建立新居，從而促使哆囉嘓社人北

<sup>113</sup> 今嘉義縣中埔鄉，為清代嘉南平原進入內山地帶的交通孔道，也是土牛界外漢人與阿里山番接觸的前鋒。今中埔鄉社口村清代設有公廨，為阿里山通事吳鳳辦公處所，現仍有「忠王祠」為人祭拜。筆者於2010年4月27日進行現地攷察所得。

<sup>114</sup> 參見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第四冊，頁410-412；劉澤民、陳文添、顏義芳編譯，《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頁188、189。

<sup>115</sup> 此一現象，即原為熟番生活領域，因官方政策被劃為界外，可能還發生在其他熟番部落，有待未來進一步釐清。

<sup>116</sup> 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1043。

向白水溪更內陸地帶移動。基於治安考慮，康熙年間，清廷在哆囉嘓與大武壠兩社域接近阿里山番的沿山地帶立石為界，因而哆囉嘓社域東半部一度劃為界外。<sup>117</sup> 隨熟番、漢人族群的陸續進駐，枕頭山以西地帶始再收入國家版圖（直到清中葉，部分地區仍處於土牛界外）。

十八世紀中葉，在國家力量較少觸及的沿山丘陵地區，以哆囉嘓村落為中心，其周緣族群多元而複雜；東面有強悍的阿里山番（其中沘水仔、關仔嶺已成為漢人村落），南有漢人及大武壠派社、蕭壠社、蔴荳社等熟番他群移來、聚居與開墾。大致上，哆囉嘓社及其他熟番社移入之初，為沿山丘陵地區的主要族群。本文擬由哆囉嘓新社具主體性的命名方式，說明之。

十八世紀中葉，哆囉嘓社人在枕頭山西側山腳下、白水溪東方小支流附近，形成岩前村落；依古文書資料，社人自稱新居為「哆囉嘓社岩前庄」。<sup>118</sup> 另在白水溪上游南岸約 220 公尺的丘陵地，<sup>119</sup> 建立「白水溪社仔頂庄」；並深入其東方山間，形成「哆囉嘓社响潭庄」（俗稱險潭）等村落。<sup>120</sup>（圖二、圖三；詳後）

從「哆囉嘓社」岩前庄、响潭庄與「白水溪社」仔頂庄的村落命名方式，似乎哆囉嘓社分成兩個不同系統。此或來自前舉十七世紀 Dorko 由 Magkinam、Bakloan 兩個村落組成的歷史傳承。因資料限制，目前無法進一步分析哆囉嘓社人組成村落的方式。但無論在行政上或對外關係上，「哆囉嘓社」為所有關係社的集稱；官方設有一名哆囉嘓通事管理社務並負責對外溝通、聯絡。

值得注意的是，社人在急水溪上游形成的新村落，均保有具主體性的村落稱呼，而未出現本文第三節所述十八世紀初中葉在急水溪中游的「番社」泛稱。除了白水溪（以溪名為村落名）、响潭（險潭）、岩前（以上因地理位置）外，其他小村落如鱒坑、溪底（以上以地形命名）、坑內（因地勢高低不平而得名），主要依當地的地形命名。以移入九重河流域的大武壠新移民的五個村落名，主要依當地的地形、產物命名，<sup>121</sup> 也可以佐證十八世紀中葉熟番為當地主要族群的看

<sup>117</sup> 大武壠社域可能也有類似情形，值得再釐清。

<sup>118</sup> 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哆囉嘓社古文書〉，T305D252：002-000。

<sup>119</sup> 根據臺灣地區地名整合檢索系統資料，白水溪山高度約 220 公尺，其下方的白水溪村落，則位於 140-150 坡度間。其東北方的險潭地勢較高，約在 300-350 公尺間。

<sup>120</sup> 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哆囉嘓社古文書〉，T305D252：003-000、009-000。

<sup>121</sup> 參見施添福總編纂、陳國川編纂、林聖欽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七：臺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頁 195。



法。其中「石碑仔」因有座石碑而得名（今碑文已無法辨識），村落內的公廨為社人的信仰中心；石碑仔南邊的集村「六重溪」地名緣起，跟溪流曲流有關；六重溪右側的頂埔，位在九重溪高位河階上，「崁下仔」則在頂埔河階臺地下方；位於石碑仔東方山谷間的檳榔腳（檳榔山前緣，又稱九重溪），因多數居民種植檳榔而得名。<sup>122</sup>

依據官方埔、漢村落「莊」、「社」的區別，哆囉囑位在界內地區的村落，分別冠上「哆囉囑社」岩前庄、响潭庄與「白水溪社仔頂庄」；移入之初，仍屬「界外」的大武壠派社村落，則直到官方力量介入後（最遲1770年代立碑時，前已述及），始出現「大武壠派社」的對外集稱。

以上說明哆囉囑社群在白水溪一帶開闢新生活空間之初，其周圍雖有漢人村落分布，從其具有主體性的村落命名方式，說明熟番為當地優勢族群的事實。本文第二節指出，漢人入墾哆囉囑社域之初，不僅沿用部落、村社的原有稱呼，指稱原住族群居址（如舊咯社、倒咯囑社），也沿用社名為漢莊命名（如在舊咯社附近的漢莊，稱為「新舊咯庄」）。此種尊重原住族群原有聚落舊稱的現象，也常見於西部平原（古文書）的舊地名。<sup>123</sup>

然而，當漢人拓荒生活隨其開墾活動的成果逐漸穩定、人數日多，社經勢力超越熟番原住族群後，開始以其所思強加在熟番身上，並逐漸顯現其為臺灣社會多數族群的特質。<sup>124</sup> 如十八世紀初中葉，在哆囉囑舊社北邊出現「番社」；<sup>125</sup> 在其東南方有「番仔嶺」（一重溪附近，今東山區科里里）外，<sup>126</sup> 十八里溪內有

<sup>122</sup> 檳榔為南部臺灣熟番的嗜好品，也是祭拜太祖的重要物品，直到今日仍如此。當地據說原為哆囉囑人居址，大武壠派社人進入後，往北遷徙。有待釐清。

<sup>123</sup> 如麻豆崙、武鹿（在牛罵〔頭〕社域）；烏瓦礁、杉漢崎（在水裡社域）；阿佛地、轆遇勝勝（在大肚社域）；巴巴里（在阿東社域）、烏瓦礁（在半線社域）、眉屯、孩兒安（以上在馬芝遴社域）、哩洋（在貓羅社域）、夏里莊（在東螺社域）、巴劉巴來（在大突社域）。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330、443、452、478、540、596、600、700。

<sup>124</sup> 所謂優勢族群／多數族群（majority），指居於社會主導地位的社會人群：（1）他們有足夠力量視自己為正常、具較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2）有能力正當化本身不平等對待少數族群的理由；（3）有能力將自己的意願、標準與法律加諸整個社會，並否定或壓制不同於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的人群，並常視少數族群為能力低劣、不正常與危險的對象。參見李憲榮，〈加拿大族群政治和政策〉，收於施正鋒編，《族群政治與政策》（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頁225-226。另關於majority與minority的討論，可參見Norman R. Yetman ed., *Majority and Minority: The Dynamics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1)。

<sup>125</sup> 洪敏麟、陳漢光、廖漢臣編，《臺灣堡圖集》，番社圖。

<sup>126</sup> 參見藍鼎元，《東征集》，〈記十八重溪示諸將弁〉，頁83。

「番仔坑」、「番仔厝」等地名（現當地仍留下「番仔厝」地名），由其具有族群意涵的名稱，顯係由漢人所給的村落名。換言之，漢人入墾臺灣之初，作為一個少數族群與外來的新移民（the outsiders），多半入境隨俗（其實漢人也無法以本身想法規範社人）。但當漢人主流社會逐漸形成，相對成為少數族群的平埔人開始受其某種壓迫、忽視與剝削、歧視。

依據筆者過去針對臺灣中部漢人優勢社會形成之研究，<sup>127</sup> 指（1）臺灣中部各地的「番社」、「番仔城」、「番仔藪」等地名的出現，多半在雍乾年間漢人墾殖成果逐漸累積以後。因此，由這些帶有族群用語「番」字的地名，可以判斷其為漢人入墾後始形成的部落新居；（2）在其他帶有「番」字的地點，如「番婆井」、「番公井」或「番婆橋」等，其附近也都為漢人社會逐漸形成以來平埔社群駐足地；這些帶有「番」字的地名，通常也都分布於新社附近。（3）以上「番××」泛稱地點，一般都分布在旱田、<sup>128</sup> 墓園或河口低地，一方面說明適合漢人水田化耕墾的社地，清代以來多已成為漢人耕墾的良田；而在清代科技無法改善地力、避免水災的貧瘠旱地與低窪地帶等不適合漢人農墾活動之地，反而成為社人最後的保留地。<sup>129</sup>

上述說明漢人主流社會逐漸形成時，始得以用具有區別漢人我群與熟番他群的族群用語「番××」等來泛稱所有與平埔部落具有某種關聯性的事務。即將清初原為官方用以區分原住族群與漢人住所的族群用語「(番)社」，普遍使用於俗民社會的現象，應在漢人優勢社會漸次形成時。此一現象也見於南部臺灣。除前舉哆囉嘓社域外，如表三、四所示，蕭、蔴兩社域內的平原地帶，「番××」地名多出現在十八世紀初、中葉，而不見於更早的清初時期，更不會出現在明鄭時期。因為漢人成為臺灣社會的優勢族群，不早於十八世紀初。

<sup>127</sup> 參見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頁 103-136。

<sup>128</sup> 以清代的耕墾、灌溉技術，以及作物品種而言，屬地質差較難大量生產之地。

<sup>129</sup> 但也有少數例外的情形，如岸裡社群透過大規模的「割地換水」方式，進行「番業漢佃」的土地經營型態，在漢通事張達京的支持下，雖然 1730 年代，社人所能直接支配的土地，僅餘岸裡舊社所在的后里臺地東半部，與臺中盆地東北半部二處。由於「割地換水」目的在於換取水源以灌溉耕地，岸裡社人所擁有的地區，除了舊社后里臺地東半部非貓霧揀圳流路所經，社人所經營之地不一定屬於貧瘠旱地或低窪地帶。參見施添福，〈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以清代岸裡地域為例〉，收於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頁 45-52。

沿山丘陵區則有些不同；「番××」出現時間多在十八世紀末、進入十九世紀時。前舉十八世紀中葉，大武壠派社移入之初，其新居未被漢人以「番社」泛稱命名。但嘉慶3年（1798）的「典契」，立契人大武壠派社番桂、耀等承祖父分內的山田位於「番仔藔」，說明距離大武壠社群入墾九重溪之初，大約二世代40年左右（以一代20年計算），漢人已逐漸成為沿山丘陵區的優勢族群。

整體而言，大約十八世紀中葉，哆囉囑社域以糞箕湖為界，以西為漢人優勢社會；以東沿山丘陵區，雖然漢人、熟番錯雜而居，卻是以熟番為主體的社會。此一形式，到十八世紀末可能已有所改變。從古文書資料顯示，進入白水溪流域的漢移民，不斷向各熟番社租贖、買賣耕地，嘉慶年間，其經濟地位已居於各族群之上，成為沿山邊區各熟番社的土地經營代理人與債權人。<sup>130</sup> 十九世紀以來，漢人勢力更越過熟番；不僅出現白水溪庄的埔、漢混居現象，也發生十五股漢人侵墾白水溪土地的事件。從沿山哆囉囑村落生活圖像可具體說明。

### （三）十八世紀末以來沿山哆囉囑社村落圖像

#### 1. 聚落形成

白水溪流域的哆囉囑新社，包括「哆囉囑社岩前庄」、「哆囉囑社响潭庄」與「白水溪社仔頂庄」三聚落。

##### （1）哆囉囑社岩前庄

依據乾隆 34 年「哆囉囑社番管業碑」資料，岩前庄的形成時間，最晚不遲於此時。雖然其對外交通受限於地形，不如白水溪庄便利（建莊時間應不比白水溪晚，人口總數也相當，詳下），而未成為教會優先考慮作為傳教的據點，<sup>131</sup> 卻得以在埔、漢族群勢力競逐中保有防衛上的優勢。至今，其村落內部格局與外圍形式（圍牆），仍保留相當完整的傳統部落佈局，易於防衛、團結居民。

<sup>130</sup> 參見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第四冊，頁 410-412；劉澤民、陳文添、顏義芳編譯，《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頁 188-189；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哆囉囑社古文書〉，T305D252：001-000~009-000；林玉茹主編，《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頁 214-225。

<sup>131</sup> 因此由教會宣道初期的場所，選擇以白水溪庄為據點，聯繫吉貝要、番仔田（蘇荳社新社，在今臺南市隆田區隆本里）、頭社（蘇荳、蕭壠、目加溜灣、社仔社等新社，在今臺南市大內區頭社里）、木柵（新港社新社，在今高雄市內門區木柵里）等熟番村落。參見 William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London: Trübner, 1889), vol. II, pp. 234-238.

岩前、白水溪兩熟番村落間，隔以漢人村落仙草埔（原為哆囉囑社地），族群關係頗緊張。據當地耆老回憶：

岩前與白水溪，每每遭受優勢族群攻擊，下場卻十分不同。故當地有句諺語「白水溪像裂紙、岩前鐵骨山、仙草埔攻不破」。<sup>132</sup>

不僅反映急水溪上游的族群關係複雜，且十九世紀埔、漢族群勢力有明顯強弱之分。

關於岩前的文獻資料，除了碑文外，以教會資料較齊全。依據黃茂卿的研究，同治9年（1870）基督長老教會牧師（臺灣宣教之父）馬雅各（James L. Maxwell，1836-1921）醫生到各平埔村落巡視，有意將岩前建為嘉南地區的傳教據點。<sup>133</sup>如前所論，可能因交通問題而作罷。同治12年（1873），因白水溪教友被迫攤派大仙寺（位於岩前東側）迎神賽會費用，引起埔、漢爭執。英國長老教會（第二位醫療宣教師）德馬太醫生（Matthew Dickson，1871-1876 在臺宣教），為了善後，親自前往岩前（Giamcheng）村落的哆囉囑社公廨，<sup>134</sup> 拜訪通事。<sup>135</sup>

此外，從光緒15年（1889）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17）牧師出版的書信、筆記，也有相關描述：

<sup>132</sup> 本俗諺閩南語發音問題，感謝審查人之一的校正。參見陳秀卿，〈急水溪中上游平埔聚落之比較研究（1875-1945）：以哆囉囑社、大武壠社移住村落為例〉，頁55註99，原文為「白水溪像撕紙、岩前鐵谷山、仙草埔攻不進」。

<sup>133</sup> 黃茂卿，《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九十年史（1865-1955）》（臺南：共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頁64-65、73-74、317-319。

<sup>134</sup> 甘為霖的紀錄，是目前所見最早有關岩前公廨的資料，當時公廨可能除了祭祀的功能外，主要為部落日常辦公處所。依據陳夢林，《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廬舍，頁159載：「社中擇公所為舍，環堵編竹，敞其前，曰公廨（或名社寮）。通事居之，以辦差遣。」

<sup>135</sup> 德馬太於1871年2月10日抵臺。參見Edward Band,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Taipei: Cheng Wen Pub. Co., 1972), p. 85; 蔡蔚群，《教案：清季臺灣的傳教與外交》（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頁131。另，早期通事多為習知原住民族語言、風俗的漢人，早在官方設通事職之前，這些漢人已在村社活動，因而成為社人與官方的主要溝通中介。通事在官方的層級雖然不高，但負有官方與土著間傳譯、溝通、催辦勞役等要務，即官役、官差、嚮導、賤社的角色。但由於漢通事的橫徵暴虐，常引發衝突、抗官事件，乾隆中葉改由土著擔任。有關漢通事權責暨其權力的擴張，可參見尹章義，〈臺灣北部拓墾初期「通事」之角色與功能〉，收於氏著，《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173-278。

加入我們教會的人，大部分來自一個叫做岩前〔按：今臺南市白河區〕的小村子，這個小村莊景色美麗，位於枕頭山附近低矮的山丘中間，裡面住了總共約二十戶的家庭。其中有一對父子幾乎是從我們第一次到白水溪後就一直參加做禮拜。<sup>136</sup>

據此，十九世紀下半葉岩前村落的人口規模，約 20 戶、120-140 人。<sup>137</sup> 由於岩前教會<sup>138</sup> 成立時間晚於白水溪教會，故岩前教友需步行經仙草埔的山崙小路（約 30-40 分鐘路程），到白水溪進行禮拜。但並非全部熟番居民都接受西洋宗教洗禮。<sup>139</sup> 因為教會傳教關係，位於山丘間、有美麗景色的岩前熟番村落，廣為人知。岩前南邊坑內小村落，也有社人聚居。<sup>140</sup>

## (2) 白水溪社仔頂庄

如前所述，白水溪社仔頂庄的成立時間，應不晚於岩前庄建立時。依據表二所示，道光 13 年以後，甚至到日治初期，白水溪庄的土地，包括以出贖、典或

<sup>136</sup> William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vol. II, pp. 380-386; 甘為霖著、陳復國譯，《臺灣佈教之成功》（臺南：教會公報出版社，2007），頁 186-189。

<sup>137</sup> 因清代為賦稅目的而登錄的人口（非總人口），缺乏熟番總人口數的精確數據限制，本文僅能以荷治時期的番社戶口調查資料作為說明依據。依 1650 年荷人統治全盛時期的番社戶口資料，哆囉囑社共有 32 戶/202 人，每戶規模平均為 6.3 人。據此推測，十九世紀末有 20 戶，以每戶 6-7 人計算，約 120-140 人。參見中村孝志著，翁佳音、吳密察、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社會·文化，頁 1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1043。

<sup>138</sup> 1865 年馬雅各牧師從廈門前來臺灣佈道，初期傳教工作並不順利。直到 1870 年之後，甘為霖牧師確立「醫療傳教」的策略，傳教事業始有所發展。因此將 1872-1874 年間成立的教會，稱為創始教會（絕大多數為平埔教會），岩前為其中之一。參見白尚德著、鄭順德譯，《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與臺灣原住民族的接觸 1865-1940》（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族博物館，2004），頁 2-3；臺灣教會公報週刊編，《臺灣古早教會巡禮》（臺南：人光出版社，1996），頁 169。

<sup>139</sup> 參見 William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vol. II, pp. 380-386; 甘為霖著、陳復國譯，《臺灣佈教之成功》，頁 186。依據教會〈洗禮簿（成人姓名簿）〉，清末岩前共有 10 人受洗、日治時期有 23 人，若以大正 4 年關仔嶺庄（含岩前）的熟番總人口 106 人計算，受洗人數約佔總人口 40.1%；白水溪（共 117 人）則有 90% 的熟番改信基督教。參見岩前教會藏，〈洗禮簿（成人姓名簿）〉；中村孝志著，翁佳音、吳密察、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社會·文化，頁 11-12；陳秀卿，〈急水溪中上游平埔聚落之比較研究（1875-1945）：以哆囉囑社、大武壠社移住村落為例〉，頁 136-153 的討論及本文表五。

<sup>140</sup> 參見臺南縣白河鎮戶政事務所提供，〈本籍戶口調查簿〉，0001~0049、〈本籍除戶簿〉，0050~0129，共 137 冊；另當地漢人大姓吳家老屋附近，發現岩前熟番大姓朱屋祖先的漢式墓碑，立碑時間為乾隆 60 年，現放置在吳家廢棄老屋牆邊，說明坑內與岩前具有某種關係。筆者親自探訪；另該碑文內容，可參見劉澤民，〈哆囉囑社老墳·朱姓墓碑〉，《臺灣文獻》別冊 1（2002 年 6 月），頁 9-11。

賣的方式，不斷轉入漢人手中，說明十九世紀初漢移民逐漸成為當地實際上的土地經營者。

依據耆老口述資料，十九世紀初中葉，漢人沈阿貓招集 15 股私墾白水溪庄土地（漢人視為荒埔地）<sup>141</sup> 並移入庄內定居；今當地仍有 15 股後裔。<sup>142</sup> 其中潘春家族為白水溪當地最具財力的熟番家庭；<sup>143</sup> 潘春之父潘保才生於道光 30 年（1850），較他年長且入教的教友，包括陳蔥（1829-1910，沈阿貓妻）、潘沈娘（1822-1916）等人。<sup>144</sup> 沈姓家族為今白河區昇安里三間厝的大姓，家人曾與當地平埔女性通婚，或因教會關係，不得而知。<sup>145</sup> 從沈姓入墾白水溪庄的歷史，說明漢移民勢力最晚於 1840 年代已進入白水溪庄內。埔、漢混居，與清廷庄、社分治的規定，有所出入。<sup>146</sup> 此一現象，並非獨見於偏處沿山丘陵的白水溪庄。<sup>147</sup>

十九世紀中葉的白水溪庄，不僅埔、漢雜處，漢人人口可能已超越熟番總人數。依據沈姓耆老表示，其父祖沈阿貓移墾時，漢移民僅有 7 戶（約 6、70 人）；哆囉嘓社人也不超過 10 戶（50 人）。<sup>148</sup> 就基督長老教會的記載，十九世紀末，聚集禮拜的人數（白水溪外加岩前的熟番村民）約 80-100 人，被教會列為南臺灣 14 個傳教站中，最被看好的據點之一。<sup>149</sup> 前舉並非所有哆囉嘓社人均改信基督教，說明岩前加白水溪的熟番人口約百人以上。

位於今白水溪橋（又稱泥鰍橋）東方約 1 公里處的鯪鯓坑，地形隱密。筆者探訪時但見泥濘的小石路兩旁，雜木、芒草叢生，難以通行。清代曾建有社人祭

<sup>141</sup> 按傳統部落採游耕方式，土地休耕、未利用時，容易被漢人誤以為無主荒地。

<sup>142</sup> 筆者訪問沈阿貓裔孫所得資料（2009 年 8-10 月）。

<sup>143</sup> 筆者訪問潘春家族裔孫所得資料（2009 年 10 月）。

<sup>144</sup> 參見岩前教會藏，〈洗禮簿（成人姓名簿）〉；臺南縣白河鎮戶政事務所提供，〈本籍戶口調查簿〉，0001~0049、〈本籍除戶簿〉，0050~0129，共 137 冊。

<sup>145</sup> 沈阿貓的後代與當地平埔女性通婚，其子孫自認有女性平埔祖先的血緣，也參與前臺南縣政府發起的正名運動，卻無法取得平埔原住民的登記。筆者訪問沈阿貓裔孫所得資料（2009 年 8-10 月）。

<sup>146</sup> 按清代基於治安上的考慮，埔、漢居址有所區分。其中「（番）社」指非漢民族的村落，漢人村落稱為「莊」；理論上，不僅兩者的管理系統不同，住民往來也受限制。參見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 3-116。

<sup>147</sup> 例如中部臺灣勢力極盛的岸裡部落，也不例外。參見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頁 156-173。

<sup>148</sup> 筆者訪問潘春家族裔孫所得資料（2009 年 10 月）。

<sup>149</sup> 參見 William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vol. II, pp. 380-386；甘為霖著、陳復國譯，《臺灣佈教之成功》，頁 186。

拜祖靈的公廨，同治 11 年（1872），基督長老教會牧師進入白水溪庄傳教，因社人改信，祭祀地點移往險潭，<sup>150</sup> 村落逐漸荒廢，現人煙稀少（僅一戶民家）。<sup>151</sup>

白水溪流過的凹谷有「溪底」小村落；既是白水溪聚落對外交通必經之地，也是社人耕種與休息（暫居）之所。關於溪底村落的相關記載，最早見於「吳志高事件」爆發時，牧師甘為霖先在溪坎避難，後夤夜跋涉，經溪底崎嶇的地形，奔走古道十餘里，抵達嘉義城告官求救。<sup>152</sup> 民國 54 年（1965）完工的白河水庫，是以白水溪為水源。水庫完成，溪底村落沒入庫底。

### (3) 哆囉囑社响潭庄

位在白水溪村落前方，俗稱「險潭」的小村落，在古文書資料上，社人自稱為「哆囉囑社响潭庄」；理論上應與「哆囉囑社岩前庄」的關係較親密，而是否與「白水溪社仔頂庄」屬不同系統，不得而知。雖則其地理位置更近白水溪社仔頂庄。戰後其地名門牌編號為「白水溪」，說明險潭（自然村）應為「白水溪庄」行政村的一部分（詳下）。筆者探訪時，驅車進入白水溪庄前一小段路程右轉，沿著水泥小道，向東北方山區行駛約 2 公里，下了陡坡後，先經「外險潭」；再前行約 700、800 公尺，抵達「內險潭」。

依據當地李姓居民的口述資料，李姓家族為清末沈姓漢人招募 15 股人入墾時，移住白水溪，後再分徙險潭；說明該村落的形成時間，可能在白水溪村落成立之後。<sup>153</sup> 從光緒 3 年（1877）的古文書資料：

全立出全典契字人哆囉囑社响潭庄吳萬傳、潘娘等，有承祖父母開墾山田宅物業貳段，坐落土名白水溪觀音石，……。今因乏銀費用……外托中引就，向與本社岩前庄朱屋觀出首承典……。<sup>154</sup>

<sup>150</sup> 吳新榮，〈追跡洪雅族後裔〉，《南瀛文獻》7（1961 年 12 月），頁 102-109。

<sup>151</sup> 筆者現地踏查。

<sup>152</sup> 參見楊士養著、吳新榮譯，〈南部臺灣基督教會史略〉，《南瀛文獻》2: 3/4（1955 年 6 月），頁 419；楊士養著、雷一鳴譯，〈清末宣教臺灣之英人：節錄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史〉，《臺灣文獻》7: 3/4（1956 年 12 月），頁 83；賴永祥，〈白水溪遭難〉，收於氏著，《教會史話》（臺南：人光出版社，1990），第一輯，頁 204；黃武東、徐謙信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年譜》（臺南：人光出版社，1982），頁 37；張義生，〈基督教在臺初期宣教所遭遇迫害事件的探討（1865-1895）〉（臺南：臺南神學院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頁 20；蔡蔚群，《教案：清季臺灣的傳教與外交》，頁 139。

<sup>153</sup> 筆者訪問潘春家族裔孫所得資料（2009 年 10 月）。

<sup>154</sup> 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哆囉囑社古文書〉，T305D252：003-000。

典契人吳萬傳、潘娘，自稱為「哆囉囑社响潭庄」人，他們所典出的物業係承自祖父母所開山田與宅屋。以一世代 20 年計算，說明最晚十九世紀初（嘉慶中葉），响潭庄已成立，其成庄時間或較鯤鯓坑晚；日治時期，彼此間有山崙小路可互通有無。

## 2. 村落規模與人口組成變化

如前所述，若以岩前聚落（含南邊的坑內）為中心，其北為白水溪庄（含東邊的鯤鯓坑，西側的溪底等小村落），白水溪前方為响潭聚落。究竟哆囉囑社人入墾白水河流域之初，有多少人？不得而知。從前舉乾隆 34 年「哆囉囑社番管業碑」的紀錄，官方設有管理部落的通事，說明其既有獨立的部落組織，當時已有一定的村落規模。

依據《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資料，乾隆 55 年（1790）清政府設立屯番制度時，各社屯丁數額主要依社人總額酌撥，<sup>155</sup> 其與總人口的比例如何，固然無從知悉。若以十七世紀哆囉囑社群的家戶規模 6-7 人計算，平均 6 或 7 人中抽撥一人為屯丁，以哆囉囑社有屯丁 20 名推估，<sup>156</sup> 其總人口約有 120-140 人。前舉十九世紀下半葉，岩前有 20 戶、約 120-140 人；白水溪有 10 戶、約 50 人，共 30 戶、約 170-190 人。以上數據雖非精確數字，仍可作為哆囉囑社人口成長的參考。而其入墾之初的總人口，應少於 200 人。

雖然清代的人口統計資料不夠準確，難以說明最初移住白水河流域的哆囉囑社人口總數。進入日治時期已有較全面性的人口數據，略可呈現清末以來的人口成長狀況。以明治 38 年（1905）首度進行的全臺性戶口調查統計為例，主要以清末保的行政區劃為基礎，哆囉囑社裔的人口資料被納入哆囉囑東下保；該保總人口數為 4,356 人，其中熟番 573 人，除了哆囉囑社外，另包含六重溪的熟番村落（大武壠派社）人口。<sup>157</sup> 換言之，受限於行政區劃，日治初期的人口普查，無法真正反映哆囉囑社的人口狀況。

<sup>155</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1023。

<sup>156</sup> 參見中村孝志著，翁佳音、吳密察、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社會·文化，頁 1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1043。

<sup>157</sup> 參見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臺北：該部，1907），頁 14-19。



經過殖民政府幾番行政區劃改革，<sup>158</sup> 大正 4 年（1915）以大字為單位的統計方式，兼有各類人群分布資料。<sup>159</sup> 當時哆囉國社域的熟番人口主要集中於吉貝要、六重溪、關仔嶺、白水溪，少數在糞箕湖（今白河區河東里）。<sup>160</sup> 其中吉貝要為蕭壠社建立的新社、六重溪為大武壠派社聚居地，其餘為哆囉國社人村落。按因行政調整，日治初期白水溪流域的村落，包括仙草埔大集村及白水溪、關仔嶺兩散村聚落群。<sup>161</sup> 哆囉囑村落岩前被納入仙草埔庄（另含仙草埔、內厝、外厝、頂寮、下寮、大仙寺巖頂等以漢人吳姓為主姓的小村落）。其餘白水溪、險潭，以及鯤鯓坑（現已散庄）、溪底（已埋入水底）等小村落併入白水溪庄（包括漢人村落姜仔崙）。大正年間，又將岩前納入關仔嶺庄轄區。該庄以枕頭山腰碧雲寺為核心，另含半嶺、巖腳與火山的散村。可見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名雖有調整，仍沿用清代的莊域範圍。

簡言之，清末哆囉囑村落分別納入哆囉囑東下保關仔嶺莊、白水溪莊。此外，哆囉囑西保糞箕湖莊也有少數社人落足。如表五所示，關仔嶺庄總人口數 1,012 人，含內地人 71 人，福建籍 838 人（82.81%），熟番 106 人（10.47%），外國人

<sup>158</sup> 包括置縣（1895-1901）、置廳（1901-1920）及置州（1920-1945）等時期的變遷。白水溪流域的熟番人口，先是納入嘉義廳店仔口區哆囉囑東下保關仔嶺莊、白水溪莊，與哆囉囑西保木屐寮庄；再改為臺南州關仔嶺、仙草埔、白水溪、糞箕湖木屐寮。參見〈臺南民政支部直轄區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 3-13-2-2（1895），頁 78-93；〈臺南廳支廳設置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 599-16-2-2（1901），頁 142-158；〈鹽水港廳支廳設置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 599-7-2-2（1901），頁 54-61。

<sup>159</sup> 日治時期的人口資料，主要依據殖民政府的人群分類而登錄。由於其戶口登記依父系法則進行，在舊簿「種族欄」的登錄上，平埔男子與漢人女子婚生子女被登記為「熟番」；平埔女子與漢人男子所生子女則為漢人。換言之，對混血兒身分與埔漢婚姻關係的呈現，官方統計數據採忽略的態度。

<sup>160</sup>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大正四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臺北：該部，1918），頁 60-70。

<sup>161</sup> 關於清代急水溪上游各集村、散村，如何變成日治時期的仙草埔庄、關仔嶺庄、白水溪庄，除了殖民政府「廢社入庄」的行政調整外，推測與十九世紀劉銘傳推行清賦事業、進行行政區調整有關。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文叢第 197 種，1964），頁 1：「清光緒十一年臺灣著手建省，需用浩繁。巡撫劉銘傳鑒於臺灣民間『隱田』特多，因奏准『量丈田畝、清查賦稅』以增加收入，並藉以建立土地制度的基礎。此項工作，計自光緒十二年四月開始籌劃、至十八年五月結束，中經編制保甲、清丈、改賦以及發給丈單，先後歷時六年兩個月之久。……當日清丈完成，各縣廳編製有土地清丈『簡明總括圖冊』，現在〔按：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按：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尚藏有淡水、新竹、鳳山三縣圖冊抄本可供查閱。」另關於清末清丈區域之街莊社相關分析，可參見洪麗完、陳秀卿，〈戰前臺灣邊區熟番社會發展之考察：以六重溪庄為例〉，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辦，「第一屆臺灣史研究論壇學術研討會：臺灣光復六十五周年及其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1 月 5-10 日，頁 8-11。

3 人；白水溪庄總人口數 275 人，其中福建籍 158 人（57.46%），熟番 117 人（42.55%）；糞箕湖庄總人口數 1,770 人，其中內地人 11 人，福建籍 1,757（99.3%），熟番 2 人（0.11%）。以上總計熟番 225 人，佔三庄總人口的 7.36%，其中白水溪庄、關仔嶺庄所佔比例相當（分別為 52%、47.1%）；漢人則達 90.06%。可見經過清代的族群空間調整，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哆囉囑社人主要聚集在白水河流域，而且當地已成為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sup>162</sup>

表五 大正 4 年哆囉國社裔人口分布暨其他族群之總人數

保名	庄名	總計 (男:女)	內地人 (男:女)	福建人 (男:女)	廣東人 (男:女)	熟番 (男:女)	外國人 (男:女)
哆囉囑東下保	關仔嶺	1,012 (540:472)	71 (38:27)	838 (445:393)	0	106 (54:52)	3 (3:0)
	白水溪	275 (143:132)	0	158 (81:77)	0	117 (62:55)	0
哆囉囑西保	糞箕湖	1,770 (943:827)	11 (6:5)	1,757 (936:821)	0	2 (1:1)	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大正四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頁 60-70。說明：日本治臺第二年（1896），為了有效控制臺灣社會，開始進行各類居民的戶籍登記；在戶籍制度與相關統計資料上，主要依據清代的人群分類（以行政區劃而非族群意識為依據）<sup>163</sup> 而稍作調整。按清廷依統治與餉稅關係，分別臺灣非漢民族為兩種不同的群體，即已文明化的「熟（熟番）」，與未開化的「生（生番）」。據此，日本殖民統治者將「熟」、「生」等非漢族群與「福（祖先來自福建）」、「廣（祖先來自廣東）」等漢民族，統稱為「本島人」，以與來自日本本土、自稱「內地人」的殖民者相對照。以上分類，從明治到昭和年間略有變動。<sup>164</sup>

<sup>162</sup> 戰後重新調整，將白水溪、關仔嶺西側，與舊大字糞箕湖的木屐寮東側劃為一里，其中以仙草埔為最大集村，故沿其名為仙草里。今哆囉囑社裔的居住空間，分屬於臺南市白河區仙草里 8-9 鄰（岩前）、12-13 鄰（白水溪）、14 鄰（險潭）。參見王世慶，《臺灣省通志稿·卷一土地志》（臺北：捷幼出版社，1999），第三冊，頁 199。依據〈仙草里里民聯絡簿（97 年度）〉（仙草里里長林介仁自印）資料，險潭（14 鄰）有 7 戶；岩前（第 8 鄰 1-6 號）共 17 戶。

<sup>163</sup> 關於福、廣的分別，參見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小塚本店印刷工場，1928），頁 4-7；Sow-theng Leong, in Tim Wright ed.,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8).

<sup>164</sup> 最初本島人不包括生番。更正確地說，昭和 7 年以前的戶口統計，分內地人（含朝鮮人）、本島人（普通行政區的漢人：包括福建與廣東、其他熟番、生番），與生番地的生番以及外國人。但大正 14 年以前的國勢調查（五年一次）不包括生番人口。昭和 7 年及以後的分類，將朝鮮人自內地人分離、獨立成項，生番則納入本島人，不再獨立成項。此外，改外國人項為「其他外國人」。昭和 10 年，戶口規則再調整，戶籍簿的種族欄全部被取消，但官方於戶口調查數據仍維持舊有形式——內地人、本島人、朝鮮人、中華民國人、外國人的分類。其中本島人項下改變為「福建系、廣東系、其他漢人系、平埔族、高砂族」等。昭和 11 年，再次調整戶口規則，戶口調查數據中的「種族」，分為本籍、國籍；其中本籍包括內地籍、本島籍、朝鮮籍，國籍有中華民國籍、其他外國籍。昭和 12 年以後，又將本島籍改為臺灣籍。參見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課編，《明治三十六年臺灣

## 五、結論

明清時期，故居在八將溪（今八掌溪）至二層行溪（今二仁溪）間及其東側沿山地區（即南嘉南平原及集集竹崎丘陵、內門丘陵，約今臺南市境）的熟番族群，在現代學術族群分類上，包括歸入狹義西拉雅族（Siraya）的蔴荳、新港、蕭壠、目加溜灣、大目降等社群，以及四社熟番（Taivoan）大武壠社群、洪雅族（Hoanya）哆囉囑社等。他們均屬於學界所稱的南島語族（Austronesian，又稱馬來波利尼西亞〔Malayopolynesian〕）。其傳統經濟生活主要為山田燒墾並從事狩獵、漁撈與採集野生植物的種子、植物纖維，以及種植根莖類作物等。<sup>165</sup> 此種生產方式所能維持的村社規模，一般不大。<sup>166</sup> 因此，社大人繁之時，必然分支發展、往外擴散。此為臺灣南島語族村社發展的一般過程。此外，搬遷也涉及習俗、信仰等因素。<sup>167</sup> 換言之，因生產方式、人口增加、習俗或信仰關係，原住民村社的遷徙、擴散活動，十分頻繁。

歷史時期以來，嘉南平原南端熟番族群在社域內的搬遷活動，既是南臺灣平埔社會的重要現象，其往漢人拓墾邊區移動的特色，也是臺灣西海岸平埔社群的共同生活經歷。然而如大武壠社群與蔴荳、蕭壠等社移入哆囉囑社域的情形，則獨具一格。而十八世紀中葉哆囉囑社人往沿山邊區的社域搬遷，除了明清時期漢人的移墾影響，也與熟番他群的移住活動息息相關。

---

現住人口統計》（臺北：該課，1903）；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編，《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該課，1908-1909）；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該課，1910-1933）；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常住戶口統計》（臺北：該課，1934-1942）。

<sup>165</sup> 不同於距今 3-5 萬年前的更新世冰河時代晚期已在臺灣居住的舊石器時代人類，這群移民而來的新文化，以新北市八里區的大坌坑遺址下層為代表，故考古學者稱為大坌坑文化，其年代距今 7,000-5,000 年之間，或可延續到 4,700 年前。由於其與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之間並無直接發展關係，而且在臺灣又找不到大坌坑文化的祖型文化，因此，一般學者認為這群人由海外移民而來，Peter Bellwood 更將大坌坑文化視為南島族群的起源文化，並繪出南島民族遷徙過程的時空分布圖。參見劉益昌，《存在的未知：臺中地區的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9）；Peter Bellwood, “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Scientific American* 265: 1 (July 1991), pp. 88-93.

<sup>166</sup> 如臺灣西部平原的族群，一般人口規模為二、三十人至百人不等，只有嘉南平原的四大社人口規模較大，從一千至三千人都有。參見 John R.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2；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八：番俗雜記，頁 163。

<sup>167</sup> 參見石再添，〈濁大流域聚落分布與地形關係的研究〉，《臺灣文獻》28: 2 (1977 年 6 月)，頁 82。

十八世紀中葉，哆囉嘓社人在白水河流域（急水溪上游）聚集生聚以來，直到今日仍為白水溪仙草里當地主要居民之一。<sup>168</sup> 他們應是文獻紀錄上目前所知當地最早居民之一。本文以舊社在急水溪中游的哆囉嘓社人，如何展開其搬遷社域東面白水河流域的行動並形成以熟番為主體的社會為中心，一方面試圖重建哆囉嘓社域限縮、社址變化暨其搬遷沿山丘陵地區的歷史，一方面勾勒明清時期漢人入墾以來，對南嘉南平原暨集集竹崎丘陵、玉井盆地熟番生活領域變遷影響的整體面貌。除了探討熟番族群出走原鄉的緣由與影響外，同時考察埔、漢勢力變遷圖像與熟番移住模式，並回應過去有關清代熟番聚居沿山地帶的主張之適用性。指清代哆囉嘓社的搬遷行動，涉及埔、漢間的生存競爭及熟番他群的移墾活動。其中漢人以來自中國的閩南人為主，雖則客籍人士可能早於康熙年間已進駐；熟番包括原鄉在南嘉南平原的蕭壠、蔴荳，與玉井盆地的大武壠等社群。

有關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熟番聚集沿山丘陵、深山地區的現象，由於清代為賦稅目的而登錄的人口（非總人口），缺乏精確數據，無法具體描述熟番遷徙規模，也不能呈現埔、漢空間分布狀況。藉助於日治初期較清代準確的人口資料，略可呈現清末族群空間分布及長期以來埔、漢勢力的變遷情形。<sup>169</sup> 根據相關統計資料所示，南嘉南平原及集集竹崎丘陵、內門丘陵（今臺南市境）的熟番人口，總計 6,295 人，佔全體居民總人口（包括漢與非漢族群）308,582 人的 2.03%。清代自今臺南市境移出境外的熟番人口，其中在現高雄市甲仙、杉林與六龜等區境（大武壠社群）有 9,034 人，佔全部熟番人口的 54.55%；在花東地區約有 1,231 人，佔 7.43%。<sup>170</sup> 換言之，留住原鄉的熟番人口僅佔原居今臺南市境的全體熟番

<sup>168</sup> 2008 年 8 月，仙草里總人口 720 戶、1,822 人，其中男性 1,078 人，女性 744 人。但 1996 年，依張溪南《白河鎮志》的資料，總共有 2,765 人。在山區有如此多人口，除了仙草埔為大集村的因素外，主要與 1963 年設立白河祭民之家有關。因老祭民逐漸凋零，現在人口反而減少（1,822），但性別比例仍明顯呈現男多於女的不平均狀態。參見「數位臺南村里通」網站資料，下載時間：2011 年 4 月 10 日，網址：<http://tn.village.tnn.tw/village05.html?id=119>；張溪南等撰，《白河鎮志》，頁 89。

<sup>169</sup> 明治 38 年，臺灣首度出現全面性人口普查的資料。但較正確的統計數字，開始於大正 4 年。參見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頁 14-19；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大正四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頁 60-70。

<sup>170</sup> 以原鄉在嘉南平原南端及玉井盆地（今臺南市境）的熟番 6,295 人，內門丘陵（原高雄縣境）的 9,034 人及花東地區的 1,231 人，共 16,560 人計算。按原高雄縣境的 9,034 人，分布於楠梓仙溪東里（今杉林區、甲仙區）、加祥外里（今岡山區）、加祥內里、羅漢內門里（以上均內門區）、羅漢外門里（今旗山區）；花東地區的 1,231 人，包括西拉雅族（混有少數四社熟番）的新開園（今臺東縣池上鄉錦園村）、璞石閣（今花蓮縣玉里鎮太昌里）、螺仔溪（今花蓮縣富里鄉石牌村），以及四社熟

人口總數的 38.01%，其中哆囉囑、蕭壠、蔴荳、灣裡、大武壠派社與新港等社，主要聚集集竹崎與內門丘陵等地；移住境外內山地區的熟番人口則高達 61.73%，以新港、大武壠社群為主，大部分聚集在原高雄縣及花蓮縣境。

根據日治時期的人口資料及田野調查所得，<sup>171</sup> 日治時期熟番在原鄉的居址，主要分布在（1）哆囉囑社故居（今白河、東山）：除了哆囉囑社人外，主要為蕭壠、蔴荳、大武壠社人移住、聚居地，（2）蕭壠社故居（今佳里）：蕭壠社人居址，（3）蔴荳社故居（今官田）：蔴荳社居址，（4）大武壠社群故居（今大內）：蕭壠、蔴荳、目加溜灣、社仔社移住地，（5）卓猴社故居（今山上）：卓猴社人居址，（6）大武壠社群故居（今左鎮）：卓猴社、新港社移住地，（7）大目降社故居（今新化）：大目降社居址，（8）大武壠社群故居（今楠西、玉井、南化）：大武壠社人居址。其次，分布於新港社故居（今新市、龍崎、關廟、永康、西港、鹽水、柳營等地），主要為新港社人居址。

以上熟番居址，除了目加溜灣的舊社（今臺南市善化區）已無社人駐足外，<sup>172</sup> 其他主要集中於各社群的舊社及其在沿山地帶的擴散地。即各社的擴散、遷徙活動並非廢社他遷，但主要聚集故居東方沿山丘陵地。此種分布狀態，與本文所論十八世紀中葉，漢人拓墾勢力發展結果，平原地帶的熟番社域逐漸變成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熟番則遷往沿山地帶的漢人社會邊區，甚至偏遠的花東地區的趨勢，若合符節。但十八世紀末以來，沿山丘陵地帶最初原以熟番為主體的社會已有所改變。

過去有關清代熟番聚居沿山地帶的討論，至少有以下幾種說法值得回應。歷史社會學家柯志明，立基於歷史地理學家施添福的土牛溝基礎並進一步理論化族群三層制的分析（將施的土牛虛線部分變成實線）。柯書乃少數針對清代族群政

番的觀音山莊（今玉里鎮觀音里）、大庄（今富里鄉東里村）、挽興庄（蠻人埔、萬人埔；今富里鄉萬寧村）、蔴加錄庄（今富里鄉馬加錄）、里巷庄（里行；今富里鄉明里村）。參見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頁 14-20；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1900 年原刊），頁 66-67。

<sup>171</sup> 筆者自 2003 年夏天起，除了長期在各地進行訪查外，為了瞭解熟番後裔分布，也調閱今臺南市境與部分高雄市與臺東、花蓮縣境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目前共調閱舊臺南市（429 冊）、舊臺南縣（2,673 冊）、舊高雄縣（252 冊）與臺東（252 冊）、花蓮（252 冊）等縣。

<sup>172</sup> 依據筆者調查所得，除了目加溜灣的舊社（今臺南市善化區）已無社人駐足外，哆囉囑（今東山）、蕭壠（今佳里）、蔴荳（今蔴豆）、新港（今新市）、大武壠社群（今楠西、玉井），均有少數社裔聚居。

治與熟番地權進行分析且重要的歷史制度論作品，有關熟番遷徙沿山地區的現象，強調其被官府「重新配置」於漢人社會邊區的看法。<sup>173</sup> 歷史人類學者John R. Shepherd（邵式柏）則認為（1）清政府的邊陲控制策略，主要以平埔社群作為戍邊的對象，而山腳地帶的環境較有機會從事游耕、狩獵，因此吸引一些社人移居；（2）部落社會因受中央統治政策的影響，造成部落內部權力結構的重整，形成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新領導階層與較淺的傳統勢力；通常傳統勢力受漢文化洗禮較少，與官方關係較差，也是勢力較薄弱的群體，因而搬離舊居，前往近山地帶定居者多半為這群人。換言之，熟番社群的遷徙活動與清廷中央統治政策（理性計算）的發展有關。<sup>174</sup>

本文發現哆囉嘓與蕭壠、蔴荳及大武壠社群等熟番他群，遷居哆囉嘓社域東側的沿山邊區的活動，早在乾隆年間土牛新、舊界劃定時已展開。移住原因涉及番漢族群、有些還與熟番他群間的生存競爭有關；既非國家政策安排而遷居，亦無關傳統生活方式的維持與否（帶著受漢文化洗禮的生活方式而移住），<sup>175</sup> 而是迫於現實生活壓力，主動尋找突破的行動。無論施添福的「國家壓迫說」，<sup>176</sup> 或柯志明的「重新配置」，乃至John R. Shepherd的「理性計算」主張，都不盡然可解釋哆囉嘓社、大武壠社群與蕭壠社、蔴荳社等在哆囉嘓社域沿山丘陵區的新社形成之背景。

其次，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相對於平原地區，由於自然條件限制，哆囉嘓社的東半部社域，並非漢人進行漢式水田耕種的第一選擇，故得以成為熟番各族群延續其族群命脈之地。雖則沿山丘陵區仍不乏存在埔、漢競逐的緊張關係。至於哆囉嘓社及鄰近南嘉南平原、玉井盆地等熟番的新生活空間接近，所處自然環境類似，面臨漢人社會發展的處境也頗一致；無論哆囉嘓社的被迫遷徙或蕭、蔴與大武壠社群等主動擴散生活領域而來的熟番族群，他們在沿山地區彼此間的交流如何？值得筆者未來進一步就族群遷徙與文化交流的議題，進行討論。

<sup>173</sup>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頁55、154。

<sup>174</sup> John R.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p.357-358, 388-390.

<sup>175</sup> 雖然沿山邊區確實較平原地區有機會採集並狩獵。參見洪麗完、簡文敏，〈西拉雅族日常生活變遷研究（1700-1950）：以飲食為例〉（臺南：臺南縣文化處結案報告，2010），第三章。

<sup>176</sup> 指族人為了避免國家剝削（稅賦、勞役等）而出走。但本文第二、三節指出，出走的熟番仍須繳交社餉。參見施添福，〈清代臺灣岸裡地域的族群轉變〉，頁301-332。

## 引用書目

- 〈仙草里里民聯絡簿（97年度）〉（臺南：仙草里里長林介仁自印）。
- 〈本籍戶口調查簿〉，0001~0049、〈本籍除戶簿〉，0050-0129，共 137 冊。臺南：白河區戶政事務所藏。
- 〈洗禮簿（成人姓名簿）〉。臺南：岩前教會藏。
- 〈哆囉囑社古文書〉，T305D25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臺南麻豆、佳里地區土地文書〉，T0393D03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臺南麻豆林家土地文書〉，T0359D029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臺南麻豆林家文書〉，T0411D033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臺南蔡自記土地文書〉，T0230D0201。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二輯第三冊。臺北：王世慶蒐輯（影本）。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v. 35-23-12-3、v. 599-16-2-2、v. 599-7-2-2。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庫」，網址：<https://sotokufu.sinica.edu.tw/sotokufu/>。
- 「清乾隆中葉番界圖」，檔號：善本室 A909.2232.704。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 「數位臺南村里通」網站資料，下載時間：2011 年 4 月 10 日，網址：<http://tn.village.tnn.tw/village05.html?id=119>。
- 《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文書契約·永久保存公文類纂》，編號：od-ta\_02161\_000165-0001-u.doc、od-ta\_02161\_000159-0001-u.doc。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下載日期：2009 年 11 月 15 日，網址：<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 Junius, R. (著)、林偉盛 (譯)
- 1996 〈R. Junius 給東印度公司的阿姆斯特丹商館諸董事的報告：一六三六·九·五〉，《臺灣文獻》47(2): 65-84。
- 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in (著)、江樹生 (譯註)
- 2003 《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臺北：漢聲雜誌社。
- 中村孝志 (著)、翁佳音、吳密察、許賢瑤 (編)
- 2002 《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社會·文化。臺北：稻鄉出版社。
- 六十七
- 1961(1747) 《番社采風圖考》，臺灣文獻叢刊第 9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尹章義
- 1989 《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王世慶
- 1999 《臺灣省通志稿·卷一土地志》，第三冊。臺北：捷幼出版社。
- 白尚德 (著)、鄭順德 (譯)
- 2004 《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與臺灣原住民族的接觸 1865-1940》。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 石再添
- 1977 〈濁大流域聚落分布與地形關係的研究〉，《臺灣文獻》28(2): 75-94。
- 石萬壽
- 1981 〈西拉雅平埔族的阿立祖信仰〉，《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8: 143-181。

- 1990 《臺灣的拜壺民族》。臺北：臺原出版社。
- 甘為霖（著）、陳復國（譯）
- 2007 《臺灣佈教之成功》。臺南：教會公報出版社。
- 伊能嘉矩
- 1910 《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會社。
- 1928 《臺灣文化志》，中卷。東京：刀江書院。
- 杜 臻
- 1961(1684) 《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朱淑芳
- 1987 〈關仔嶺聚落的形成與發展：以嶺上林業與嶺下溫泉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余文儀
- 1962(1764) 《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吳新榮
- 1961 〈追跡洪雅族後裔〉，《南瀛文獻》7: 102-109。
- 李亦園
- 1994 〈章回小說《平閩十八洞》的民族學研究〉，收於莊英章、潘英海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頁 23-41。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李國銘
- 2004 《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
- 李壬癸
- 1992 〈臺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臺灣風物》42(1): 211-238。
- 李文良
- 2003 〈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31: 141-168。
- 李憲榮
- 1997 〈加拿大族群政治和政策〉，收於施正鋒編，《族群政治與政策》，頁 223-239。臺北：前衛出版社。
- 村上直次郎
- 1933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第二卷第一號：新港文書》。臺北：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 阮旻錫
- 1956(1683) 《海上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周 璽
- 1962(1830) 《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東嘉生
- 1944 《臺灣經濟史研究》。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
- 林玉茹（主編）
- 2009 《臺南縣平埔族古文書集》。臺南：臺南縣政府文化局。
- 林志秋
- 1999 〈漢化平埔族村落的神聖空間：以臺南縣東山鄉吉貝要聚落為例〉，《臺灣人文》3: 87-116。



林清財

- 1995 〈從歌謠看西拉雅族的聚落與族群〉，收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 475-49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2000 《歌謠、聚落與族群：論臺灣西拉雅族的歌謠》。臺北：東江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林春水

- 1956 〈白河鎮志（上）〉，《南瀛文獻》3(3/4): 58-66。

林朝榮

- 1966 《臺灣之河谷地形》，臺灣研究叢刊第 8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柯志明

- 2001 《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洪敏麟、陳漢光、廖漢臣（編）

- 1969 《臺灣堡圖集》。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洪敏麟

- 1984 《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洪麗完

- 2007 〈清代楠仔仙溪、老濃河流域之生、熟番族群關係（1760-1888）：以「撫番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4(3): 1-71。
- 2009 《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10 〈婚姻網絡與族群、地域關係之考察：以日治時期大武壠派社裔為例〉，收於戴文鋒主編，《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 II》，頁 77-116。臺南：臺南縣政府、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 2011 〈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臺灣史研究》18(1): 41-102。

洪麗完、陳秀卿

- 2007 〈急水溪上游沿山地區三個哆囉囑移住村落之比較研究〉，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07 年沿山地區研究群工作坊」，2007 年 7 月 24-25 日，頁 1-26。
- 2010 〈戰前臺灣邊區熟番社會發展之考察：以六重溪庄為例〉，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辦，「第一屆臺灣史研究論壇學術研討會：臺灣光復六十五周年及其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1 月 5-10 日，頁 1-36。

洪麗完、簡文敏

- 2010 〈西拉雅族日常生活變遷研究（1700-1950）：以飲食為例〉。臺南：臺南縣文化處結案報告。

施添福

- 1995 〈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以清代岸裡地域為例〉，收於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頁 39-73。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1995 〈清代臺灣岸裡地域的族群轉變〉，收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 301-33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施添福（總編纂）、陳國川（編纂）、陳美鈴（撰述）

- 2008 《臺灣地名辭書·卷八：嘉義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施添福（總編纂）、陳國川（編纂）、林聖欽（撰述）

2002 《臺灣地名辭書·卷七：臺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高拱乾

1960(1696) 《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翁佳音

1984 〈頭社的阿立祖祭典〉，《臺灣風物》34(2): 98-104。

曹永和

1981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溫振華

1997 《高雄縣平埔族史》。高雄：高雄縣政府。

張雅連

1998 〈大河戀：臺灣重要水系〉，《臺灣月刊》183: 4-7。

張義生

1985 〈基督教在臺初期宣教所遭遇迫害事件的探討（1865-1895）〉。臺南：臺南神學院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溪南等（撰）

1998 《白河鎮志》。臺南：白河鎮公所。

張瑋蓁

2002 〈東山鄉吉貝要聚落居民的生活方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陳正祥

1993 《臺灣地誌》，中冊。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陳秀卿

2010 〈急水溪中上游平埔聚落之比較研究（1875-1945）：以哆囉嘓社、大武壠社移住村落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陳夢林

1962(1717) 《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榮輝

2004 〈臺南縣史·平埔族群篇（期末審查報告書）〉。臺南：臺南縣政府委託。

陸文照

2003 〈吉貝要（Kapas-au）聚落之研究（1904-1976）〉。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莊英章（主編）

1988 《臺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曾品滄

2006 〈從番社到漢庄：十七至十九世紀麻豆地域的拓墾與市街發展〉，《國史館學術集刊》7: 1-44。

曾振銘、童元昭（主編）

1999 《噶瑪蘭西拉雅古文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曾國明

2003 〈日治時代楠梓仙溪中游地區的土地開發與區域特色之形塑〉。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程家穎

1963 《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臺灣文獻叢刊第 18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梁茂隆（編著）

2000 《西拉雅族麻豆社人》。臺南：麻豆總爺文史工作室。

黃典權（編）

1966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黃叔瓚

1957(1724) 《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黃武東、徐謙信（編）

198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年譜》。臺南：人光出版社

黃茂脚

1988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九十年史（1865-1955）》。臺南：共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智偉

1999 〈統治之道：清代臺灣的縱貫線〉。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春榮

1997 〈葫蘆福佬裔漢人的祀壺行為〉，收於黃應貴、葉春榮編，《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先生紀念論文集》，頁 91-127。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9 〈西拉雅平埔族的宗教變遷〉，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臺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1999 年 5 月 1-3 日。

2000 〈阿立祖信仰的地方化〉，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 年 10 月 23-25 日。

楊士養（著）、吳新榮（譯）

1955 〈南部臺灣基督教會史略〉，《南瀛文獻》，2(3/4): 9-22。

楊士養（著）、雷一鳴（譯）

1956 〈清末宣教臺灣之英人：節錄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史〉，《臺灣文獻》7(3/4): 79-84。

楊 英

1958(1662) 《從征實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3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灣教會公報週刊（編）

1996 《臺灣古早教會巡禮》。臺南：人光出版社。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3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灣文獻叢刊第 15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4 《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19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

1985(1900) 《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成文出版社。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

1928 《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小塚本店印刷工場。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編）

1903 《明治三十六年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

- 1907 《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地方之部）》。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
- 1918 《大正四年第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概覽表》。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
- 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編）
- 1908-1909 《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
-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
- 1910-1933 《臺灣現住人口統計》。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
- 1934-1942 《臺灣常住人口統計》。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
- 劉良璧
- 1961(1741)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劉澤民、陳文添、顏義芳（編譯）
- 2001 《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劉澤民
- 2002 〈哆囉嘓社老墳·朱姓墓碑〉，《臺灣文獻》別冊 1: 9-11。
- 2002 《平埔百社古文書》。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2003 〈從古文書看清代柴坑社與黃竹坑社之關係〉，《臺灣文獻》別冊 4: 15-18。
- 2004 《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續編》。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劉益昌
- 1999 《存在的未知：臺中地區的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 潘英海
- 1994 〈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頭社太祖年度祭儀的文化意涵〉，收於莊英章、潘英海主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頁 235-256。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1994 〈聚落、歷史與意義：頭社村的聚落發展與族群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 89-123。
- 1995 〈在地化與地方文化：以「壺的信仰叢結」為例〉，收於莊英章、潘英海主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二）》，頁 229-319。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1995 〈祀壺釋疑：從祀壺之村到壺的信仰叢結〉，收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 445-473。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1998 〈「文化系」、「文化叢」與「文化圈」：有關「壺的信仰叢結」分布與西拉雅族群遷徙的思考〉，收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 163-202。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蔡蔚群
- 2000 《教案：清季臺灣的傳教與外交》。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鍾寶珍
- 1992 〈惡地上的人與地：田寮鄉民生活方式的形成與內涵〉。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盧嘉興、吳新榮（纂修）
- 1980 〈臺南縣志：卷一自然志（上）〉，收於吳新榮等主修，《臺南縣志》，第一冊，頁 1-114。臺南：臺南縣政府。

賴永祥

1990 《教會史話》，第一輯。臺南：人光出版社。

戴文鋒（主編）

2010 《東山鄉志》，上冊。臺南：東山鄉公所。

戴炎輝

1992 《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文敏

1999 〈小林地區平埔族群聚落形成與發展〉，收於廖峰正主編，《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研討會論文集》，頁 84-98。高雄：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

簡炯仁

2002 〈大武壠芒仔芒社與高雄縣六龜鄉老濃流域的拓墾〉，《臺灣風物》52(1): 127-191。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1909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

1904 《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上卷。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藍鼎元

1958(1722) 《東征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1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Band, Edward

1972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Taipei: Che'ng Wen Pub. Co.

Bellwood, Peter

1991 "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Scientific American* 265(1): 88-93.

Campbell, William

1889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London: Trübner.

Leong, Sow-theng, Tim Wright (ed.)

1998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Shepherd, John R.

1984 "Sinicized Siraya Worship of A-Li-Tsu."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58: 1-81.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etman, Norman R. (ed.)

1991 *Majority and Minority: The Dynamics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Ethnic Interaction, Migration and Expanded Living Space of *Shufan* in Mountain Peripheral Areas of Jia Nan Plain during Qing Dynasty: A Study of *Duo-luo-guo-she***

Li-wan Hung

## **ABSTRACT**

The mi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ha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in history. This paper traces the migration and the expanded living space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ountain peripheral areas of Jia Nan Plain during Qing Dynasty. Ancient literatur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Qing Dynasty, household registry records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oral histories and other religious data were reviewed. Field work was also carried out to examine in particular the migration of *Duo-luo-guo-she* to hillside areas in face of competition from both the Hans and other aborigines.

With the influx of Han immigrants, *shufan* of *Da-wu-long-she*, *Madou she* and *Xiaorong she* not only faced intense competition for survival but also suffered the reduction in living space. As a result, beginning from the 1850s, they moved out from their original settlement in Jia Nan Plain and the hills of Neimen northward to the living territory of *Duo-luo-guo-sh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migration of three tribes of *shufan* to new distant settlement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Duo-luo-guo* aborigines was also explored in the light of the change in living space.

Before the 1860s, the Qing government began putting T'u-niu boundary epitaphs (*tu niu xin jie*) all over Taiwan, clearly demarcating territories under Qing rule. The main reason behind the migration of *shufan* to the hillside near Bai-shui River was competition for survival, rather than driven by state policy or motivated by their desire to preserve their traditional lifestyle. From the mid 18<sup>th</sup> century when the *shufan* first migrated and then settled, they had remained the dominant tribes in the hillside areas of Jia Nan Plain. Poor accessibility of the areas and sterile land had contribu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living spac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shed light on the somber hist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shufan* communities, but als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thnic groups and migration patterns along the mountain peripheral areas.

Keywords: Ethnic Relationship, Bai-shui River, *Duo-luo-guo-she*, *Xiaorong she*, *Madou she*, *Da-wu-long-pai-she*, T'u-niu boundary

